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始终把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写在自己的旗帜上。1927年4月27日~5月9日，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监督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开启了党的纪律建设新纪元。近百年来，党的纪律建设不断深化发展，有力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为全面展示党的纪律建设光辉历程，2016年3月，在中央纪委、湖北省委重视支持下，在湖北省纪委、武汉市委领导下，武汉市纪委等筹建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历史陈列馆。

2019年5月9日，位于武汉市武昌区都府堤56号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历史陈列馆建成开馆，展厅面积约4000平方米，展出《纪律建设永远在路上——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历史陈列》等展览。

（图、文由武汉革命博物馆提供）

目 录

编委会名誉主任：彭富春 陈邂馨

顾 问：（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心耀 刘富道 严昌洪 何祚欢
陆永初 涂文学 萧志华 彭小华
董宏猷

编委会主任：张明权

编委会副主任：陈 光 朱向梅
杨 华 李修文
陈国方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尹 鹏 甘 琼 龙桃仙 吕照清
刘重武 陆建军 陈立新 郑学军
姚四平 曾艳红 谢受贵 窦 梅
潘红莲

主 编：陈国方

副 主 编：华 蕾

本期责任编辑：华 蕾

编 辑：张川蕾 游 迎

封 面 设 计：王 鹏

红色印记

<<< <

4 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历史陈列馆建设亲历记 / 高万娥

文化传承

<<< <

11 追梦古砚得高趣 雕琢石君谱新篇 / 吴和平

商聚汉皋

<<< <

16 全力, 为健康 / 陈光明(口述) 张川蕾(整理)

20 深耕主业, 树立建筑安装行业金字招牌 / 徐卫忠

精工匠心

<<< <

24 倾心邮路 / 徐 龙(口述) 白爱萍(整理)

武汉文史资料

WUHAN CULTURAL & HISTORICAL DATA

CONTENTS

2021 年第 8 期 (总第 346 期)

委员天地

<<<< <

28 一名来自律师界老政协委员的体会 / 刘昌国

31 提案线索就在你身边 / 陈荣华

往事漫忆

<<<< <

35 往昔数十年求学与任教的追思 / 刘宋川

42 大集学校的那些人和事 / 周 敏

人物春秋

<<<< <

50 红色伉俪从鄂豫边烽烟走来 / 罗建华

史海钩沉

<<<< <

55 户部巷食话 / 曾庆伟

楚风汉韵

<<<< <

60 文联大院漫记 / 张明建

主 管：政协武汉市委员会

主 办：武汉市政协文化文史和
学习委员会

编辑出版：《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发行单位：《武汉文史资料》发行部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4-1737

国内统一刊号：CN42-1056/K

印 刷：武汉市仁达印刷厂

出版日期：每月 28 日

定 价：8 元

地 址：武汉市汉口沿江大道 246 号

邮 编：430010

电 话：(027) 82220667

(027) 82220669 (传真)

E-mail: whzxwszl@163.com

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历史陈列馆建设亲历记

◇ 高万娥

2019年5月9日，位于武汉市武昌区都府堤56号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历史陈列馆举行开馆仪式，正式对外开放。

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历史陈列馆是在中央纪委、湖北省委高度重视下，在湖北省纪委、武汉市委领导下，由武汉市纪委和原武汉市文化局共同主持建设的全面展示党的纪律建设光辉历程的专题性展馆。展览从全党全国的角度，全面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加强纪律建设的历史脉络，全面呈现了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纪律建设工作走过的光辉历程，为英雄城市武汉又增加了一处红色打卡地。

作为一名文博工作者，我亲历了陈列馆建设的全过程，为陈列馆的建成和开放付出了很多心血和汗水，也凝聚了我对革命文物的一份特殊情感。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之际，回首那段难忘的日子，更增强了我作为一名革命文物工作者的职业神圣感，更坚定了我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信心和力量。

（一）

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历史陈列馆的建设，首先要追溯到中共五大及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

1927年4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在位于武昌都府堤20号的国立武昌第一小学风雨操场隆重举行。由于形势严峻，出于安全考虑，第二天的会议便转到汉口济生三马路黄陂同乡会馆进行。出席会议的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张国焘、毛泽东、李维汉、彭述之、任弼时、刘少奇、李立三等97位代表（这

是武汉革命博物馆在改陈时考证的结果，党史正本为82人），代表着全党57967名党员。

中共五大是在中国革命运动进入极其艰难的时期在武汉召开的。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公开背叛革命，血腥屠杀革命人士。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地相继以“清党”名义，大规模

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土地问题议决案》《职工运动议决案》《组织问题议决案》等议决案，探讨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明确提出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实行土地革命等指导革命的正确原则，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大会初步提出了健全党的领导体制和组织系统的一系列措施，将中共中央领导机构改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监督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中纪委前身）；确立民主集中制为党的指导原则并写入党章；首次提出“政治纪律”的概念，并将其摆在纪律建设的突出位置；一批杰出人才入选中央领导机构，为党的自身建设作出重大贡献。但由于共产国际的指导错误和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的影响，大会未能提出挽救中国革命的具体措施。不可否



中共五大会场历史照片（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提供）

认的是，中共五大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艰难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也反映了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成长的历史进程。

由于历史原因，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第五次大会在实际上就没有解决任何问题”的观点占据上风，中共五大的功绩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宣传。随着我们党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精神的深入贯彻，中共五大的研究逐渐得到重视和客观、公正的评价。2007年11月30日，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国家文物局、湖北省委、省政府和武汉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和高度重视下，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落成并对外开放，同时还召开了“从中共五大到八七会议”学术研讨会。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的建设，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革命旧址保护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发挥革命旧址的革命传承、教育引导和红色旅游功能的成功范例。

2008年12月，为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和中纪委恢复重建30周年，武汉市纪

委决定依托中央监察委员会在武汉诞生的历史，在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举办反映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历程的基本陈列展。2009年3月，《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历程展》开展。中纪委、国家文物局、湖北省委、武汉市委领导均出席开幕式。展厅面积近600平方米，有400多幅图片、复制件、文照以及30多件实物，全方位展示了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反腐路线、方针，先进模范人物、典型案例等。2010年5月，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被中纪委确定为全国首批廉政教育基地。

随着形势的发展、时间的推移，《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历程展》的内容、形式和空间已渐渐不能满足观众的参观需求。尤其是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重视反腐败工作，展览的改造提升就被提上议事日程。

（二）

2013年11月22日，那是一个非常难忘的日子，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王岐山在湖北调研，专程前往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参观了《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历程展》。作为馆长，我全程参与了接待工作，王岐山书记是博物馆界的前辈，他平易近人、侃侃而谈的风度让我这个参与接待的文博人不至于特别紧张。在参观过程中，王岐山书记还专门问我中共五大的历史贡献是什么？当我准确无误地回答后，他满意地说：“我就是要考考你这个当馆长的对中共五大有没有研究。”他说过去他来武汉多次，就没有认真来中共五大会址看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他这次来就是寻找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源头和根脉，寻根溯源。在中共五大上，选举产生了中央

监察委员会（中纪委前身）——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监督机构，开启了党内监督制度的组织创新，高举起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监督执纪的伟大旗帜。中央纪委与中央监委一脉相承。他还指出，学历史最重要的是理论联系实际，要历史关照现实。大革命失败后，包括王荷波在内的10名中央监察委员和候补委员，先后有8人牺牲，无一人叛党投敌，用生命诠释了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为鲜艳的党旗增添了绚丽的光彩。王岐山书记告诫我们，每个党员干部都要像他们一样，模范地遵守党章党规。王岐山书记的视察更坚定了我们改造提升《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历程展》的决心和信心。

这次改造提升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要扩充展览面积，增加展览内容，此外，最好选址在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周边。在这个过程中，我特别要提到武汉市纪委原副书记王守宪同志，他为陈列馆的选址和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付出了很多心血。至今，王守宪同志依然还在为弘扬红色文化、传播革命精神四处奔波。还有市纪委派驻市文化和旅游局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沈必晟同志，他在协调财政、规划、园林、武昌区等各部门为陈列馆的建设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最早的选址方案是位于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的北侧，也就是现在都府堤的筷子湖泵站处，但因该处提前已有规划，方案被否。就在我们为选址一筹莫展时，2014年年底，位于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南侧、武昌都府堤与中华路交汇处的中共武汉党史馆落成，该场馆建筑面积近7000平方米，展厅面积3500平方米。能不能将《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历程展》的改造提升就放在党史馆，两个展览各占一半面积呢？我们的想法得到武汉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2015年

12月16日,时任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省纪委书记侯长安,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市纪委书记车延高一行调研中共五大纪念馆,参观《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历程展》后,召开现场办公会,决定将建成的党史馆用于《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历程展》易址改陈,并决定将新馆建设成为全国一流的革命传统教育、党史教育和党风廉政教育基地。



2019年5月,湖北省、武汉市纪委领导参观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历史陈列展

2016年年初,中共湖北省委、省纪委经过申报,中纪委批复同意《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历程展》易址改陈。时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王岐山和有关领导对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充实丰富《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历程展》有关内容的报告作出重要批示,展览筹备工作正式启动。

(三)

2016年3月,展览筹备工作启动后,在武汉市委、市纪委和原市文化局的统一部署和协调下,来自中国监察学会及武汉市党建、党史、文博、高校的专业人员迅速组成策展工作专班,决定在原来展览的基础上,按照“向前延伸、向后拓展、中间完善”的指导方针,开始编写展览大纲。

展览大纲暂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党风廉政建设历史陈列馆陈列大纲》,大纲从源

头追溯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执纪监督、反腐败斗争的光辉历史,增加了马克思、列宁的建党理论与实践,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关于纪律建设的探索等内容;补充完善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纪律建设、执纪监督、反腐败斗争的内容,总结党在不同历史阶段中纪律建设的工作特点与成效;同时,重点突出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践行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等内容。

2016年4月,经过策展专班的深入、细致工作,展览大纲扩充为一本内容完整的文字大纲。6月25日,在北京召开了展览大纲专家研讨会。时任中纪委廉政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孙志勇、中纪委宣传部副局级纪检监察员戴军、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主任李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

研部副主任卢洁、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李东朗、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程美东等领导和专家对展览大纲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大纲政治方向正确、主题意义重大、结构合理、内容全面、资料丰富、重要史实准确，并对大纲提出了进一步的修改意见，如突出重点、理论创新、统一风格、增强思想性与教育性等。

2016年8月3日，在江汉关博物馆会议室，时任武汉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张曙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历程展》易址改陈工作专题会议，张曙书记听取了展览方案、展陈招标、场馆公装等情况汇报和工作建议。会上，我就提炼展览主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最后，张曙书记充分肯定了前期展览大纲撰写阶段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并提出下一步大纲深化设计要进一步挖掘展览特色、品质与内涵，精准呈现展览的“魂”。

2016年8月9日、22~24日，我参与组织召开了两次《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历程展》易址改陈文字方案深化设计专家咨询会，咨询会邀请省、市党史、文博界相关专家组成专家组，对展览大纲进行了充分研讨、论证，最后用四组关键词来概括展览内容：探索与奠基、推进与曲折、恢复与发展、创新与加强。会议还探讨了序厅与尾厅的设计构想，认为设计必须切合展览主题，吸引大众。

2016年10月，展览公开招标完成。中标展览公司在随后两个多月的时间内，基本确定展览重点展项9项（含序厅和尾厅），次重点展项26项。为确保展览的质量，武汉市纪委和原市文化局组织专业人员先后到郑州、长沙、南京、上海、福州等地革命纪念馆和党风廉政警示教育基地参观学习

并征集相关文献和实物资料。我也在省纪委张家洪常委和市纪委梁奇副书记带领下到西柏坡、广州考察学习。我还亲自带领武汉革命博物馆保管部的同志到江西征集古田会议决议案、老红军甘祖昌使用过的物品等珍贵文物。11月，我们又安排副馆长袁亚妮、时任陈列部主任万玲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玉贞一道远赴俄罗斯国家政治历史档案馆征集档案资料，征集到中共五大开幕和会场等珍贵历史照片，填补了国内没有早期党代会历史照片的空白，是我国党史研究领域的一个重大突破，同时也满足了展览对展品的需要。

为了更好地把握中共五大的历史贡献，2017年，由原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和湖北省、武汉市党史研究室共同主办，武汉革命博物馆承办的“聚焦1927：中共中央在武汉暨中央监察委员会成立90周年”全国性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召开，来自全国十几个省区的党史、文博界专家学者齐聚武汉，会议征集到100余篇论文，14位党史专家在大会上作学术交流，这次会议成果为做好展览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和知识资源。

至2017年年底，展厅公装、序厅群雕相继完工，展览形式设计完成，展览大纲也经过了反复修改和数次上报审核，展览布展初步完成。2017年12月15日，我参与接待了时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冯俊和第三研究部主任李颖；2018年2月11日，时值农历腊月二十八，我又参与接待了时任中纪委宣传部副部长郝宗强等领导，他们都对展览提出了修改意见。

根据上级领导的要求，我从正月初四开始在市纪委宣传部加班，在市纪委宣传部和研究室领导的帮助下，拿出初步修改方案。正月初八，我随省纪委张家洪常委、

市纪委梁奇副书记及专班的同志前往天津、广州参观学习当地廉政警示教育基地，并前往北京参观学习在国家博物馆举办的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型展览。2月下旬，湖北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王立山要求省、市纪委宣传部组成工作专班，进一步明确展览的特点和定位，对展览内容做进一步充实完善。

展陈专班围绕展现“一个红色政党从风雨如晦的历史深处走来，何以由小变大、由弱变强，何以承担使命、汇聚民心”这一命题，进行了深入思考。经过反复论证和数次打磨，展陈专班最终确定，展览要紧扣党的纪律建设这条主线，准确把握党的纪律建设的历史逻辑，充分运用党史和党建最新研究成果，全面、客观、真实、系统地反映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纪律建设理念、原则、方针及主要成果。为了使展览符合时代精神和时代要求，发挥其应有的警示教育作用，展览应该突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强纪律建设的战略部署和重要举措等重点内容。

基于以上思考，展陈专班将展馆名称确定为“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历史陈列馆”，将展览主题确定为“纪律建设永远在路上”，并决定继续对展览内容进行细致打磨，尤其是对党的十八大、十九大时期的内容进行补充和完善。最终，展览除

序厅和尾厅外，共划分为“创立与探索”“推进与曲折”“恢复与发展”“新时代新征程”四个部分。

2019年4月，经过多次上报和层层审批后，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历史陈列馆完成最终布展并通过审批。5月9日，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历史陈列馆在92年前竖起监督执纪大旗的地方隆重开馆，并推出大型展览《纪律建设永远在路上——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历史陈列》。湖北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王立山主持开馆仪式，湖北省委主要领导、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领导、武汉市委主要领导出席开馆仪式并参观展览。展览面积近3000平方米，展出700多幅历史照片、525件（套）文物资料，其中珍贵文物38件（套），辅助展项47处，全面、客观、真实地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纪律建设理念、战略方针及主要成果，是全国唯一全面反映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历史的专题展馆。



2020年5月17日，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历史陈列馆展览参与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终评时，高万娥馆长在线上向评委汇报

(四)

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历史陈列馆建成开放后，立刻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现已接待全国各地机关、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团体 5000 余家，观众近 100 万人次，成为党员干部接受纪律教育的重要阵地，成为广大群众接受革命历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

2019 年 5 月 22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赵乐际在湖北调研期间，参观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历史陈列馆展览，充分肯定了举办纪律建设历程展览具有重要意义，为湖北也为全党和全国办了一件宣传党史的大好事。

为进一步宣传和扩大展览的影响力，2020 年 1 月 12 日，由中国博物馆协会纪念馆专业委员会、中国文物报社、湖北省博物馆协会共同主办，武汉革命博物馆承办的“革命类博物馆、纪念馆陈列展览暨《纪律建设永远在路上——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历史陈列》研讨会”在武汉举行，来自中国文物报社和全国 20 多所一流高校和博物馆的领导、专家参加了会议，各位领导、专家以展览为切入点，共同探讨新时期革命类博物馆、纪念馆的历史使命。

2020 年 5 月 18 日，《纪律建设永远在路上——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历史陈列》荣获第十七届（2019 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特别奖”。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活动是由国家文物局指导，中国文物报社、中国博物馆协会等单位共同主办，获奖展览体现了当年度国内博物馆陈列展览的最高水平，被誉为文博界的“奥斯卡”。从 2016 年 3 月正式启动中

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历史陈列馆筹建工作，到 2019 年 5 月 9 日展馆正式建成开放，历时三年。三年磨一剑，一朝铸辉煌。《纪律建设永远在路上——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历史陈列》脱颖而出，荣获“特别奖”，既是对该展览专业性、权威性的充分肯定，同时也是对每一个参与展馆建设、展览布展同志的充分肯定。我作为其中一员，与有荣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弘扬革命传统和革命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的生动教材。中纪委前身是在武汉诞生，是历史留给这座英雄的城市宝贵的精神财富。成功举办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历史陈列展，就是从历史的起点出发，探寻监督执纪的伟大足迹，有效保护和利用革命文物，发挥革命文物资政育人、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的作用，让红色文化资源“活”起来的成功典范。

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员干部的党性教育，革命类纪念馆具有独特的政治文化优势。为此，我们将不忘初心，继续努力，为加强党性教育、培养理想信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高万娥：武汉革命博物馆馆长、研究馆员）

追梦古砚得高趣 雕琢石君谱新篇

◇ 吴和平

砚，与笔、墨、纸一道合称为文房四宝。它不仅实用，而且材质美、造型美、纹饰美，能给人以精神上的愉悦，具有欣赏价值和收藏价值，不愧“文房四宝砚为首”。“笔砚精良、人生一乐”，古代文人有的爱砚成癖，如米芾拜石的传说，苏东坡曾为江西龙尾山“罗文砚”写过一篇传记《万石君罗文传》等。清代王继香的《七星砚铭》曰：“北斗啖啖孕石君，繁忙上腾昌斯文。”可见不管是什么材料制作的砚，都可称为“石君”。还有称砚为“即墨侯”“润色先生”“石友”的，足以可见历代文人对砚的感情至深。砚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一方方砚台，叙述着一个个故事，体现了中国悠久的历史与文明。

（一）

每次提到砚雕传承，我总是会想到我的师傅、外公刘惟芹。他系江西梓溪刘氏后

裔，出生于民间艺人世家。刘氏先祖自明初从江西迁入新洲，亦将砚雕、石雕、木雕等雕刻手艺带入了新洲，并世代相传，至今已有170年历史。

外公的曾祖父刘定镗（1814～1878年）原本是民间石雕艺人，早年因家境贫困，流落他乡，先后在湖北广济，江西九江、上饶等地以出苦力、打石雕和加工建筑石料为生。在卖苦力的同时，也从江西星子、上饶等地同行朋友中学会了砚台雕刻。晚年因常年劳累，身体欠佳，做石雕已力不从心，无法再从事繁重的石刻工作了，便只好在江西以制砚、卖砚为生，并成为新洲刘氏祖传砚雕的开创者（第一代传人）。

外公的祖父刘典洪（1835～1899年）系刘氏祖传砚雕第二代传人。早年随父亲以石雕、木雕为生，后亦转向制砚业。他带领家人长期在新洲以加工出售江西、湖北、安徽等地石料制作的金星砚、罗纹砚、玉山砚等砚台为生。他选料十分考究，砚雕技艺



2018年，吴和平在工作室创作砚雕作品《喜迎军运》

高超，也很善于经营管理。清光绪年间是刘氏砚业最兴旺时期，在外高祖刘典洪的带领下，制砚生意已十分红火，请了不少制砚师傅，砚台不仅销往新洲附近县市，亦远销江西、四川等周边省份，经济也一度走向富裕。刘典洪曾在1885年前后耗费两年多时间，在新洲刘坎桂湾建造了一所占地面积一亩有余、以木质为主、木雕与石雕相结合的双层四合院住房。据外公讲，他小时候听说修建此房仅木雕、石雕就耗费工时有一年半之久，曾在当地令人非常羡慕。此房曾存有大量书画、木雕、石雕、石砚等古迹，现只有少量木雕画板、透雕门窗、石砚等尚存。在当时砚业兴旺之际，四川文人曾赠送三米多宽木匾，而今虽凸起的金字已毁，却仍能看出阴刻落款“四川龙安府平武县知县杨进士赠”等字样。我小时候常听妈妈和大舅讲，此四合院仅一间小房所拆木料就在20世纪60年代建造了一所肖桥人民公社办公场所。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此房还是我军的联络点和出入地，房间有适合藏人藏物的专用夹墙。当时李先念也曾多次出入此地，并与

外公等人经常有交往。外公及大舅也因几次保护、私藏新四军而被国民党吊在树上毒打。

到了清晚期，刘氏砚业已达到鼎盛，但由于用外省砚料运输不便，砚产品开始转向以湖北产砚石为主，基本形成了湖北特色的“楚砚”。外曾祖父刘功坦（1879~1944年）从小随父亲刘典洪制砚，是刘氏祖传砚雕的第三代传人，也是远近闻名的

的制砚高手。其父亲病故后，便由他带领外公刘惟芹（1900~1986年）操持全家手工制砚作坊。外公刘惟芹成为刘氏祖传砚雕第四代传人。但由于清末民初之战乱，砚业及祖辈的经营从此走入了低潮，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前，全家只能靠手艺和农耕等赚取的微薄收入勉强度日。

在我的记忆中，外公是一个倍受尊敬、德高望重之人。在全村，他不仅年长、辈份高，而且很有学识，全湾百姓家中如有重大事情办理，人们都是第一时间向他请教，由他来主持。外公一生做人、做事都很谨慎、安分守己，他的砚雕、木雕等多种传统技艺除了早年常从事之外，后来就很少做了。直到我十几岁时，由于受家庭环境影响，也十分酷爱金石书画，他才将绘画、砚雕等技艺传授于我，并常常讲述祖辈砚雕的故事，希望我能将其发扬光大。我至今还记得，那时外公见我绘画天赋，便主动在农闲和休息时将我接到家中学习雕刻、书画，还不时弄点鸡汤、鸡蛋为我补补身体。每次吃鸡汤时，无论我的画作、雕刻是否好，鸡腿都是留给

我吃，所以即使过了几十年，外公及舅父家后人仍然有正月初二外甥拜年必须吃鸡腿的习惯。1985年，我应聘成为新洲石材厂美工，并主持组建了石材厂工艺车间，这时砚雕的传承重任才正式落到了我的肩上，也使我真正成了刘氏祖传砚雕“楚砚”的第五代传人。无论未来怎样变化，我都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将祖传砚雕技艺传承下去，使这门艺术不至断藤，这也是对先祖的慰藉和交代。

（二）

米芾在《砚史》中写道：“器以用为功。”又曰：“石理发墨为上，色次之，形制工拙，又其次，文藻缘饰，虽天然，失砚之用。”米芾总结宋代制砚以实用为第一，石砚中的天然色彩和雕琢装饰当列第二和第三位。故砚雕不同于石雕，它的首要功能是实用，这是其存在的前提，也是直接制约其美学价值的因素。砚的实用功能是研磨时“发墨”，该功能主要体现在砚堂磨墨、砚池储水、蓄墨。砚雕设计时务必做到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因此，通常在设计时砚堂要大，次为墨池，也不宜过小。决不可堂小、雕刻装饰过大，那样就成了石雕。年长的砚雕师傅常常强调：“做砚要学古人。”我们家的经验是“追梦古砚得高趣”，起初外公对我讲的时候我并不是很理解，为什么他总是要我学古人？总做些看似简单的“抄手砚”“仿古砚”“蝉形砚”？总是说什么作品线条欠佳、线面处理不合理？经过几年的雕琢，我终于明白了其中的奥秘，通过这类“仿古砚”的加工，不仅让我提高了审美能力，懂得了审美情趣，知道了线条美，更重要的是从一开始就把握了砚的本质——实用功能，难怪叫“追梦古砚得高趣”啊。在安徽、江西、

甘肃等多地至今仍有很多砚雕师傅一生只做“抄手砚”“蝉形砚”“箕形砚”等“仿古砚”。绝大多数砚工制砚往往也是从“抄手砚”“仿古砚”开始的。

据地质部门不完全统计，我国古今砚石有90余种，可正在生产的仅40多种，只有一半在用。为了实现砚的实用功能——“发墨”，必须选择相应的优质石料，砚石的岩石类型主要是沉积岩和变质岩，可分为泥岩、板岩、砂岩、灰岩等多种，并呈现多种石色与石品花纹。比较有名的有“四大名砚”——端砚、歙砚、洮河砚、澄泥砚（非石质）及青州砚、松花砚、贺兰砚等近20种。选好石料是进行精品砚雕设计加工的前提，有了好的原材料方能进行设计。

制作砚台一般要经过采石、维料（制璞）、雕刻、磨光、配盒等多道工序。

采石，即开采砚石，是制作砚台的重要一环。不同砚台品种有产地区别，同一砚种也有坑洞之别、优劣之分，名坑质优，故有“端石一斤，价值千金”之说。采石是砚雕中最辛苦的活，现如今我的石料虽然多数是从石农手中选购，但我仍经常在山里亲眼目睹或亲身体会采石的艰辛。开采石料不仅体力劳动强度大，而且还要会看纹路、看石脉、用巧力，这些我虽然都会，但速度和体力还是不如老采石的农民。砚石基本都不抗震，所以至今开采仍以手工采料为主，不能以机械代替，否则大量石料会被震破、震裂，无法使用，失去了石料的价值。另外，还必须按石料的生长规律，顺其自然，从接缝处下凿，尽量保证石料的完整。因此，为防止火药爆破、机械开挖及水土流失，也为了保护环境和生态资源，绝大多数地方已禁止开采砚料。

维料，又称选料制璞，开采出的石料

并不是全都可以作砚材，须经过初步打磨表皮、筛选，再将其分等级，特别好的、纯净无瑕者为特级，稍次者为甲级，有石品花纹者归入好花色之列。这个过程首先要懂得看石，全凭实践经验，要把石头看穿，通过表层石色、石纹，要能分析出里面的石品花纹。如端石要由表看到里面的石眼、绿色翡翠带或白色外围火捺、鱼脑冻等内部花纹。砚工还要根据石料的天然形状锤或凿成天然形、蛋形、长方形等砚形砚式的砚璞。不仅要会看石，还应将砚石最好的地方留作设计墨堂（即砚堂），一方砚台的优劣可以从墨堂作评价，鉴赏石品花纹亦放在墨堂部位。

雕刻，是砚雕制作过程中最重要的工序。要使一块天然朴实的砚石成为一件精美的工艺品，首先要创作设计，充分体现和保留石料的天然美，处理得当是锦上添花，处

理不佳就会画蛇添足，甚至弄巧成拙，故要对石料做到因材施艺、因石构图，认真思考并确立题材、立意、构图、形制及雕刻技法、刀法、刀路，定稿后方可雕琢。开始时“打大体”“凿大坯”，然后用大刻刀铲滑，最后精雕细刻。

磨光，一般选用油石幼河砂粗磨，目的是磨去凿口、刀路。为提高磨光效率，对粗磨我结合自己多年天然石材加工与雕刻经验，早已制出了不同规格的金钢砂磨头，它无需河砂且比传统磨法省时省力，又快又好。磨头粗磨后即改用由粗至细的砂纸打磨，直至砚台手感光滑为止。砚台的打磨直接影响着砚的品质及使用效果。人们选择砚台除鉴别石质和石品花纹外，还常常用手按摸砚堂，看是否细腻、润滑，这一切都与磨光有直接关系。

配盒，砚台雕刻完毕后必须配上名贵木盒，起防尘和保护砚石的作用。同时，砚盒本身也是一件艺术品、装饰品。砚盒用料一般是名贵硬木材，甚至用紫檀、酸枝、楠木等。外公对砚盒很讲究，他用的一方砚就是自己雕的“四脚砚盒”，脚雕成四个豹脚形，盒面刻高浮雕梅花。外公的制砚大多沿用传统古朴风格，对我亦很有启发，故我至今仍然遵行“追梦古砚得高趣”的祖传法则进行砚台创新与雕刻，并将尽毕生精力努力探索和深入完善此理念，力争让祖传砚雕艺术发扬光大，独树一帜。

（三）

为了提高自己的审美能力和砚雕技艺，我先后到中国书画函授大学学习国画、到湖北美术学院学习雕塑、到黄山职业技术学院学习砚雕，在广东珠海从事过锌合金雕刻，



2019年，吴和平在新洲区向东小学做砚雕传承讲座

在中国泥塑之乡——黄陂从事过泥塑。记得在黄陂做泥塑期间，我总是白天上班做“加法”泥塑，晚上自己在宿舍以石材、木材或砖等做“减法”练习雕塑，不时将白天上班的泥塑产品做成小工艺品。为了不影响同事夜间休息，我就在厂房选择了一个不足10平方米的楼梯间换步台作为自己居住和加工的场地，力争通过绘画、雕塑等多项姊妹技艺学习，来提高自己的审美能力和砚雕综合实力。现在我的砚雕已基本形成了自己的突出特色：一能集“传统文人派”和“徽派砖雕派”之所长，既能体现出文人派文化内涵与功底，又兼有徽派传统镂雕特色。二能做到因材施教，除加工湖北砚外，更擅长随石品花纹、石质而创作，加工全国各地名料，作品既有石的天然美，又具人工之妙，可谓“天人合一”之美。三是每方砚台都有一个特定的主题思想，能按客户的要求来设计制作。四能将东方题材与西方造型艺术相结合，砚雕技艺与石刻、砖雕、刻瓷等结合，从而将砚雕技艺运用到传统古建雕刻、石雕、砖雕及碑林雕刻上。

1987年，我亲手设计制作的砚雕作品《康祥茶寿》《际远亮弘》《手足情深》被湖北省人民政府、省水利厅分别选送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美国有关领导和台湾友人；天然大理石壁画获市优秀新产品设计奖，为石材厂赢得了不少荣誉和经济收入。从此，我便有了“新洲石雕、砚雕第一人”“书画碑林雕刻第一刀”的美誉，也为新洲培养了大批石雕艺人，并先后雕刻过向警予、魏文伯、张体学、漆少川等许多老一辈革命家的碑文与墓志铭，“98抗洪英雄高建成”塑像，湖北省、安徽省道教协会原会长谢宗信道长肖像等雕塑。2013年，加入湖北省“六个一百”人才工程，并受到省委组织部、省

人社厅、省文联等九部委的联合嘉奖。2014年，雕刻完成了当时中国道教最高的书画碑“道德经碑”雕刻。2016年，任新洲问津大桥建设艺术总监，主持了问津大桥文化栏杆雕刻工作。2017年，应湖北省美术馆邀请，在该馆举办了个人砚雕及艺术专场展；被区政府、区委组织部授予武汉“城市合伙人·问津英才”称号。2018年，砚雕作品《龙的传人》入围第十四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精品展，并荣获第三届中国民间艺术品博览会金奖。2019年，被新洲区政府授予首席“名人名匠”称号；作品《喜迎军运》再次入围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精品展。2020年，被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匠人匠心”栏目专题报道。

我的事迹被中央电视台、湖北电视台、武汉电视台和《湖北日报》《楚天都市报》《武汉晚报》等主流媒体多次报道。近年来，除了进行砚雕创作、绘画外，我更多的是进行艺术传承活动，经常在新洲中小学、职高及武汉高校进行“非遗进校园”砚雕技艺推广传承活动，也希望这门祖传技艺能在“非遗进校园”的东风下得到永久传承和发展。

（吴和平：湖北省大师级民间工艺传承人，武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砚雕代表性传承人）

全力，为健康

◇ 陈光明（口述） 张川蕾（整理）

（一）

我是陈光明，江西鄱阳人，中共党员，现在是一晟（武汉）医学信息有限公司总经理。1996年6月，我从湖南湘潭大学毕业，来到江西省第一劳改农场（珠湖农场）工作，成为一名农场工作人员，拿着239元/月的工资。但初入社会的我年轻气盛，总想着到外面广阔的天地去闯一闯，于是半年多后，我离开珠湖农场来到了浙江。

1997年1月，正逢武汉马应龙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办事处（原武汉第三制药厂）招人，该公司是国有股份制性质的，对我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凭借努力，我进入了马应龙浙江办事处，开始在宁波奉化跑市场，渴望离开家乡后能做出一番事

业，那一年我24岁。830元/月的工资比我在珠湖农场高出不少，而且驻外还有70元/天的补贴，因此我干得很卖力，业务成绩也不错，当时的办事处主任王全为及公司领导对我都很关照。1999年12月，因为家庭原因我来到武汉，仍在马应龙药业集团公司工作。

2002年年初，我就职于一家外企——美国华生（常州）制药有限公司。在那里，我第一次接触到了精神科领域，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精神科（湖北省精神卫生中心）、武汉市精神病医院、武汉市优抚医院、武汉市武东医院（武汉市第二精神病医院）及全省的精神专科医院接触比较多。我深知精神障碍患者的痛苦，由于大部分患者需要终身服药，康复治疗所需费用比较高，很多家庭经济条件不允许，有些精神障碍患者就只能

被锁在家里，不仅生活没有质量，也没有尊严。考虑到这方面情况，我毅然决定代理精神科领域药品，立志为精神障碍患者做点事。

（二）

精神障碍主要分以下几种类型：精神分裂症、失眠症、抑郁症、焦虑症、社交恐惧症、强迫症、双相情感障碍等。精神障碍患者跟其他患者有很大的不同，具有遗传性、易受家庭及生活环境等影响的特点。他们一般是需要终身服药的，即便如此，也不能完全康复，只是恢复社会功能，能够自理、正常认知，并进行基本的社交。

精神科领域药品分为典型抗精神病药和非典型抗精神病药，典型药品是传统意义上的精神科药品，而非典型药品与传统的典型药品相比，具有作用更广、疗效更好、安全性更佳、不良反应更少、特别是锥体外系反应少等优点，能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对患者的依从性更强，所以在目前临床上均属于首选用药。

利培酮片是国内治疗精神分裂症的常用药，属于第二代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在多个国内外指南中均列为一线、首选用药，但外资制药公司的药品比较贵。2004年年底，齐鲁制药有限公司研制出仿制药利培酮片，这也是当时全国首仿药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为患者提供了优质、高性

价比的治疗选择。2005年1月，我代理该公司的利培酮片，它比原来使用的进口原药便宜，让医院和患者多了一种选择。有些患者会直接找我买药，为了减轻他们的负担，如果遇到经济条件特别困难的，我就把药送给他们，基本不要钱。武汉市汉阳十里铺有一位张阿姨，离异后带着一个女儿，女儿没有工作，张阿姨一天要吃4片（1mg/片）利培酮片，一盒药仅够吃上5天。得知张阿姨的情况后，我每次都给她送上10盒药，并嘱咐没药了就给我打电话。因为我认识很多精神科医生，我还经常带她去复查，医嘱需要换药或者需要调药时，我都免费提供：属于我代理的药品，我就送给她；不属于我代理的药品而又是医生说必须要吃的，我就自己买了送给她，我把张阿姨当作亲人一样资助和照顾，直至2016年她女儿把她带到孝感的婆婆家为止。

随着对精神障碍患者及其家庭了解的深入，我开始专注这个领域。为了更好地服务精神障碍患者，2011年9月，我在武汉市光谷时代广场成立了一晟（武汉）医学信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陈光明（右一）到建国东方大酒店慰问江西援鄂医疗队



武汉市上饶商会陈光明副会长

息有限公司，公司成立初期仅有3个员工，除了我，还有两个人分别负责内勤和销售。公司属于代理制，取得代理权后分给武汉、宜昌、襄阳、十堰等地的经销商，我主要负责推广和维护。刚开始公司经营范围小，一年的业务量仅有几百万元，而且销售的药品单一，再加上利润低，因此一年到头能赚上一二十万元就不错了，人员和资金的缺乏，一直是我面临的困难。

想要把公司做强做大，想要服务更多的人群，光靠我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2014年年初，经过朋友推荐，我进入上药科园信海医药湖北有限公司，目的是借助这个全国性的平台更好地服务患者。上药公司成立了中枢神经事业部（CNS），我是这个部门的负责人，主要负责湖北省精神科领域的业务，通过这个平台的资源、资金和人脉向全省的精神病院进行药品推广。这样，一

晟公司的业务扩展了、人员也有了，我的压力小了许多。

渐渐地，我在精神科领域有了些影响，2017年之后，很多业内有识之士陆续加入我的一晟团队，生产、经营精神科药品的厂家及商家也找上门来。直至2019年，一晟公司的推广金额达到6000多万元，推广品种多达10多种，代理了涵括治疗精神障碍疾病在内的多种药品。

“全力，为健康”是一晟的服务宗旨，立志于前沿、客观、实用的产品与服务，以促进广大患者顺利回归社会为理念，旨在打造精神科领域有影响力的企业，一晟人一直朝着这个目标在奋进。目前公司团队拥有20多人，有完整的人员架构和公司制度。

现在国家对精神障碍患者的政策越来越好，不仅提供帮扶、优扶，还可以在当地治疗、当地报销，帮助很多家庭解决了实际困难。但是我知道，我的目标还没有完全实现，我想让全省的精神障碍患者得到有效治疗和康复的心愿还需要更多人来一起努力实现，全社会对精神障碍患者的态度还需要改变……我面前的路仍然很长，需要我做的事还有很多。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上药成为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指定的保供单位之一，我除了继续上班，还积极联系硚口区长丰街道、光谷等地当了21天的志愿者。我主动承担起接送医护人员上下班、为有需要的居民买药送药的任务，有些居民可能不愿意跟我交流，我就让社区工作人员将收集来的居民买药需求反馈给我，我们再组织人员根据药单到相关单位去购买。同时在疫情期间，我也为在武汉的乡亲寻医买药、为支援武汉的江西医疗队送去生活急需品及慰问品。

我在武汉这座城市生活了20多年，对她有着太多的感情，见到疫情期间的民生百态，我当时的信念就是要为武汉人民做点事情。我给家里两台私家车都办理了临时通行证，送药品、医疗设备、口罩、消毒水、防护服等到医院、社区、相关单位，每天服务10个小时以上，回到家自觉跟家人隔离。回想当时的情形，至今仍记忆深刻。

（三）

武汉市上饶商会成立于2015年5月18日，本着“联谊乡情、互帮互助、整合资源、共谋发展”的办会宗旨，秉持“诚信、团结、务实、创新”的商会精神，不断凝聚在汉饶籍商人，加强会员间的交流，融乡情、聚乡情，为商会和会员企业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寻求共同发展的机遇。

商会在发展自身和会员企业的同时也不忘回馈社会，成立6年来持续开展公益助学活动，共资助60余名贫困学生，助学金额共计40多万元，即使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这场爱心的传播也没有中断。商会会员也以主动承担社会公益事业为责任，持之以恒地为社会的和谐与发展尽绵薄之力。我们的“武汉上饶商会饶籍学子联络计划”发挥了武汉市上饶商会中心阵地、资源枢纽的作用，旨在为湖北省、武汉市饶籍学子提供“实习就业、组织活动、企业交流、公益服务”四大主题六项服务，助力饶籍人才培养、培养，联谊家乡情谊，让武汉市上饶商会之家更加充满温度。“助学、赋能、助梦”，从助学到发挥商会平台作用，为每一位饶籍学子赋能，再到助力饶籍学子实现自己的梦想，乡情的种子就这样播撒，爱心的温暖就这样传递。

疫情期间，武汉市上饶商会充分发挥了社会组织应有的社会担当。在商会秘书处的统一指导下，积极为江西省援鄂医疗队提供后勤保障。2020年2月28日下午，商会李腮松常务副会长、吴艳兵副会长和我代表张国勤会长及全体在汉饶商看望慰问了江西省三支援鄂医疗队，为医疗队送去桶装方便面90箱、香梨120箱、老干妈辣酱320瓶、巧克力120盒、五香花生米150包等慰问物资。在得知医疗队的医护人员因照顾病人无法在正常时间内用餐，而盒饭的盒子在微波炉中不耐热也不健康后，我们当即决定为医疗队每人赠送一个微波炉碗。经多方联系，终于在中百仓储买到了质量好的微波炉碗328个，为家乡亲人送去了温馨的慰问。

我是2016年加入武汉市上饶商会的，商会是家乡人的组织，我的初衷是多接受正面的人物及事情，增强为更多人提供帮助的力量。进入商会后，大家对我的帮助很大，借助上药和商会的平台，让一晟公司认识了更多湖北省精神科领域的人，能够有幸为他们提供服务，因为只有他们才知道当地精神科领域的具体情况，如果仅依靠我个人，一晟公司是很难实现的。

虽然我是奔五的人了，但仍将秉持初心，一如既往地带领我的团队，继续在我的工作、生活中多做好事、善事，即使力量微小，也是我的一份心意。

（陈光明：一晟（武汉）医学信息有限公司总经理，武汉市上饶商会副会长；张川蕾：《武汉文史资料》编辑）

深耕主业，树立建筑安装行业金字招牌

◇ 徐卫忠

（一）

1968年我出生在江苏省海门市东灶港镇，父母都是朴实的农民，良好的家庭环境和成长教育，塑造了我简单、纯粹的性格，对我走上社会后为人处世和创业发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18岁，是成年的重要标志，对于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而言，没有现在如此隆重的成人礼仪式，但意味着已经步入成年人之列，该走上社会闯一闯了。我是家中长子，需要承担的家庭责任相对更大。我们家乡有句土语：荒年饿不死手艺人。18岁时我决定先学一门手艺，在社会上有立足之地。瓦工、电工，我都干过，还跟随原乡镇建筑公

司走南闯北，先后去过南京、无锡、大连、海南，不断磨练自己的技术本领，逐步从业务一线转到施工管理。

那个时候条件有限，想要学点东西很难，只能翻书、查资料，从实践中总结经验。20世纪90年代初期，建筑业开始扩张，大家都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只有多学、多看，没有人可以给你帮助和建议，大家都在摸着石头过河。

1997年，我跟随家乡海门建筑公司的业务发展脚步到了武汉，从此扎下根来。多年来，我们与中建三局、中建八局合作建设大型工程项目，并连续数年获得“先进专业施工队”“先进劳务合作公司”“十佳劳务合作公司”等称号，在武汉建筑市场逐渐积累了一定的名气和影响力。

受体制约束，原乡镇建筑公司发展艰难，面临改制。此时，我在行业内磨砺已久，便于2011年成立了自己的公司——武汉嘉佳琪建筑有限公司，开启了自主创业的新征程。

武汉嘉佳琪有两个资质，一是建筑安装，一是劳务。公司成立之始，我以为这数百人的管理会让我“头大”。然而并没有，我坚持抓大放小，充分发挥项目经理作用。公司一年开三次会，年头、年中、年末各一次，由项目经理抓落实，充分调动和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在实施的过程中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现在公司共有几百人，有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劳务作业人员，在武汉同行业中综合实力算比较强的。

虽然公司成立至今才刚刚10年，但已经顺利完成同济医院、协和医院、武汉水之梦等大型项目的施工，积累了丰富的施工经验，先后获得“中国安装工程优质奖”“优秀质量管理单位”等荣誉，进一步夯实了在武汉建筑安装市场的行业地位。

我与企业共勉，企业与我同在，创新奋进心牵手，收获辉煌共拥有。秉承这样的美好愿景，我和嘉佳琪全体同仁不停学习进步，不断创造梦想。

（二）

弹指一挥间，我来武汉已经20多年了。得益于自己20多年的积淀，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和一批技术过硬、基础扎实、吃苦耐劳、诚实守信的骨干力量，也有幸与中建三局等甲方的多年合作，使我的创业之路平坦了许多，随后的发展也可谓是顺风顺水，应该说我和嘉佳琪都是幸运的。

在此期间，最让我刻骨铭心的经历是2020年年初参与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既是对我新的锤炼，也是对嘉佳琪的考验，提振了嘉佳琪的发展信心。

2020年1月22日，那一天和往年一样，梳理总结了一年来公司的经营情况，处理好各项事务，我准备返回南通和家人团聚共度春节。建筑行业有个共性的特点，常年都在工地上，只有春节才能多放几天假。大家都盼望着这个节日。一个星期前，公司的施工人员和管理层都陆续放假回家了，我是最后一个离开公司的。

我自驾车辆顺利返回老家江苏海门东灶港的次日凌晨2点，传来了武汉封城的消息。我在脑海里回忆了一遍最近接触的人



2020年2月，武汉嘉佳琪建筑有限公司员工参与火神山医院建设



武汉市南通商会徐卫忠常务副会长

群，23日开始居家隔离。与此同时，我第一时间联系已经回到各自家乡的所有员工，了解情况，嘱咐他们自觉在家隔离。

1月24日下午4时，我接到一个特殊电话。中建三局领导给我布置了紧急任务——组织一支20个人的队伍，参与火神山医院建设，负责机电安装，大年初二进场。

机电安装是我公司的主业，完成专业领域内的任务，我自然信心满满。让我为难的是，彼时正是大年三十的下午，如何开口跟已经回到家中的工人们说？更何况是回到武汉施工，这个思想工作该怎么做？但疫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我相信员工的技术水平，更相信队伍的政治素质。我果断挑选精兵强将，落实“出征”人员，不到一天功夫就集结了1名项目经理、1名安全员和23名施工人员，组成机电安装突击队。1月25日大年初一晚上，满载25人的5辆

小车抵达火神山医院工程现场。从大年三十下午接到任务，到大年初一晚上全部就位，仅用了一天时间。

没有一个人跟我提任何条件，没有一个人问期间工资怎么算，没有一个人犹豫、推辞，都没有。我深受感动。

火神山医院当时有几十家单位同时参与建设，施工人数多达7000余人。根据总包安排，武汉嘉佳琪建筑有限公司机电安装突击队于1月28日上午正式进场。1月29日，又增加10名通风工，共35名逆行突击队员正式加入了建设火神山医院的伟大战斗，淹没在茫茫人群中，渺小但是伟大。

他们住宿的地方距离施工现场14公里。从宿舍乘车出发，车辆只能停在施工现场3公里外的停车场，这3公里的路程必须步行。每天早上6点出发，晚上11点收工，休息的时间仅有几个小时，人员基本处于高负荷、连轴转的状态。由于疫情影响，开始是吃方便面，后来统一安排送快餐。大家在寒风中快速扒几口饭，又赶紧去工作。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在争分夺秒和疫情作斗争。确实很辛苦，很不简单。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深知这次任务的艰巨。我人在江苏，心系武汉，采取线上指挥的方法，建立了公司火神山医院建设项目专用微信群，要求每小时在公司的工作群发一个动态视频，第一时间反馈现场情况。

2月9日下午，嘉佳琪建筑有限公司完成火神山医院施工任务，35人全部撤离现场。我及时把特殊时期的工资以及元宵过节费发给每个逆行员工。

2月10日，公司又一次接到新任务。这次任务更加艰巨：需要安排一部分员工继续参与雷神山医院的建设，另一部分员工承担火神山医院使用后机电工程维修和保养

工作，直至火神山医院停止使用。为打赢这场防疫阻击战，嘉佳琪建筑有限公司员工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他们是了不起的逆行者，也是最可爱的人。

我公司先后完成了火神山医院二号楼病房和雷神山医院C区病房共3万多平方米的机电安装调试和通风设备安装任务。我要感谢员工的支持，他们没有一句怨言，甘于吃苦，能打胜战；我要感谢中建三局的信任，作为火神山医院的总承包单位，中建三局放心把机电安装业务交给嘉佳琪来完成，这是20多年来在长期合作中形成的信任和默契。

疫情期间，我还通过武汉市南通商会捐赠现金10000元，通过湖北省江苏商会捐赠现金1000元，通过家乡村委会捐赠现金10000元，尽自己的绵薄之力，表达一份心意。

（三）

从18岁走上社会开始，经历30余年不懈拼搏，我深深感受到建筑行业日新月异、天翻地覆的改变和发展，有幸成为时代进步的见证者与参与者。不管时代如何变化，我依然坚持诚信为本、安全第一、质量至上的人生信条。几番拼搏，几经磨砺，如今，我和我的企业已成为武汉安装工程行业内的一块招牌，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和尊重。不管未来的竞争如何激烈，嘉佳琪人都满怀发展信心和工作激情，秉持务实创新的工作作风，继续专注主业、深耕主业，做好、做稳，迎接新形势下的新挑战。

从1997年在武汉扎根，我在这里工作、生活已有20多年。我喜欢开满樱花的街道、喜欢热干面的味道。在内心深处，我早已把武汉当作第二故乡。同时，对于家乡的热爱

和依恋也从未消减，并随着年龄的增长越发浓烈，这样的情愫在武汉市南通商会得到了安放和寄托。

2018年5月，武汉市南通商会成立，我积极响应并加入其中，成为一名常务副会长。三年来，我参加商会的各种活动，为老乡、商会的事情奔走，为困难群众慷慨解囊，为商会建设出谋划策。我感到，加入商会就是要讲奉献、会舍得。商会会员们舍去了很多时间、精力，甚至人力、物力、财力推进商会建设，其共同目的就是为了合作共赢、发展壮大，能得到父老乡亲们的认可，能够推进武汉、南通两地的经济发展，这是一件十分荣幸的事情。今后，我将继续充分利用商会这个平台，积极参与经济社会建设，自觉履行社会公益责任，树立南通人在武汉的良好形象。

（徐卫忠：武汉嘉佳琪建筑有限公司董事长，武汉市南通商会常务副会长）

倾心邮路

◇ 徐 龙（口述） 白爱萍（整理）

我叫徐龙，现为武汉市江岸区邮政分公司上海路揽投站投递员。2021年，我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一）

走上这条邮路，对于我来说，是传承。

2005年中专毕业后，我参军入伍，在河南省焦作市武警支队服役。个子小小的我入伍时并不被人看好，但我没有放松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凡事争先，训练和实战一丝不苟，出任务时总是冲在最前面，被部队授予“优秀士兵”称号，并获得嘉奖一次。虽说当兵只有短短的三年，但部队这个火热的熔炉锤炼了我钢铁般的意志和永不言败的精神特质。

2008年退伍后，我穿上邮政绿衣，接过母亲手里的接力棒，成为了一名邮政投

递员。与武警战士的生活比较起来，投递员的工作显得既单调又枯燥，还十分辛苦，我一时间无法适应。干了一辈子投递工作的母亲开导我说，每封信都是一份期盼和希望，投递员责任在肩，成功投递意义重大。听了这句话，我若有所思。

不久后的一天，有一封地址不详的信件，经我的多方努力查找，终于成功投递。我很高兴，成就感十足，用户也很感激，并专程到投递站来表扬我。我回家后兴奋地将这件事情告诉母亲，母亲欣慰地笑了。

从此，我找到了投递的价值，找到了邮路上的那颗心，那就是人民邮政为人民的初心，我捧着这颗心走上了邮路。

（二）

13年来，我坚守投递一线，驾驶邮车累计行驶30多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赤道

近10圈，累计投递报刊、邮件等40余万件，保持着“零差错”“零投诉”的“双零”纪录。

除了常规投递，在复活“死信”和爱心帮扶上，我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汗水。

投递员在投递中最怕遇见地址不详、无法确认收件人的疑难邮件，这些邮件查找无果后会被判为“死信”处理掉，但我从不轻易放弃这些“死信”，总是想尽各种办法将其“复活”。

有一次，我遇上了一封经多次投递未妥投的义务兵普通信函邮件，邮件上的地址已经拆迁。附近的居民告诉我，收件人是一位年逾七十的独居老人，老人具体搬到了什么地方，他们也不清楚，只知道老人是市十一中的退休人员。直觉告诉我，这封信很重要，必须要送到老人手中。下班之后，我在市十一中及周围片区搜寻了一周，却没有收获，居委会、派出所、拆迁办，能问的地方都问过了，所有人都不知道老人的去向。同事劝我放弃，我自己也在想，是不是给信件的邮寄方回一封信，告诉对方老人已经搬家？想想还是不甘心，我把同事们召集起来想办法，大家发散思维，由老人聊到了养老。这时，我突然灵光一闪：老人自己居住，会不会在房屋拆迁之后去了养老院？想到就做，我蹬着自行车去区里的三家养老院咨询。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我成功地找到了老人。老人拿到信件后，特别激动，连连称



2020年9月，徐龙获得“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称号

“没想到还能收到儿子从部队寄来的信件”，一直拉着我的手说“谢谢”。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的职业、自己的岗位是那么有价值，我很自豪。

多年来，经我的手“复活”的“死信”有100余封。

对于邮路上的大事小情，我也投注了自己年轻火热的心和脉脉温情，铺设了一条爱心邮路。自2008年入职以来，我坚持与邮路上的特困家庭结对帮扶。2019年3月1日，江岸邮政上海路揽投站正式成立了“快递小哥志愿服务队”，我率先报名，并积极参与志愿服务活动，服务孤寡老人，关爱困难儿童。

片区内一对90多岁的老两口是我的重点帮扶对象，我每个月都会抽上几天上门看看老人有什么需要，帮忙买米买菜，解决老人的生活困难。一天，我为老两口送去了一封挂号信，老人拆开后告诉我是一张医疗报销单据。大爷叹了口气说：“这张报销单已

经没用了。”我看得出大爷有点沮丧，询问后才知道，这是大爷之前在上海看病的报销凭证，需要拿着这张凭证去上海报销，而老两口已经没有精力去上海了。看着发愁的老人，我想了想说：“大爷，如果您相信我，这单据我拿走，回头我找人帮您办理。”老两口觉得不可思议，半信半疑地将单据交给了我。之后我想办法联系了上海的朋友前去办理，并把报销得到的3000元钱交给了老两口。老人十分激动，说要给我写感谢信，我微笑着拒绝了，这只是我的份内事呀。

“以后有什么事，记得随时找我哟。”我对老人说。而这句话，我对片区的好几位帮扶对象都说过，我对自己说，说出去的话就一定要做到，一定要靠谱。

（三）

2020年春节，对于我来说刻骨铭心。

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武汉封城战

疫。城可封，但医护人员的防疫物资和居民的生活物资运输不能断。危难时刻，武汉邮政人挺身而出，逆行在战疫的第一线，我也第一时间报名加入了邮政应急突击队。

我是和妻子一起上战场的。我的妻子张婷是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的一名门诊护士，战疫打响后，刚刚结束集中学习的她申请前往商职医院支援，而该院正是武汉市集中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定点医院之一。她回家跟我说的时候才知道我也报名出征了。就这样，我和妻子将3岁的女儿托付给了家中老人，一个每天坚守在运送医疗及防疫物资的路上，一个在医院救死扶伤，开始了一家五口分隔三地的日子。这一分离就是70余天。

上海路揽投站距离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武汉市中心医院仅210米，隔街相望，附近还有其他3所定点救治医院、15个发热门诊、2座方舱医院和14支外省（市）医疗救援队的驻地。随着疫情的发展，来自五

湖四海的防疫物资源源不断地来到揽投站，我每天高负荷工作超12个小时，清晨5时30分起床，6时出发，7时到达站点给邮车和邮件消毒……

当时上海路揽投站的投递任务已经没有固定的投递时间、投递线路和投递计划，所有的防疫物资随到随投，指哪送哪。一天下来，揽投站能收到六七百件快递，最多时，我一天投递了150多件。

穿着连体的防护服，骑车、搬东西都着实不方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徐龙在运送防疫物资

便，搬货送货没几趟，防护服里就闷出了汗，口罩里也满是潮气，但我知道，自己是在和疫情赛跑，必须争分夺秒，必须快点快点再快点。

2月17日，上海路揽投站收到5个邮件，那是长沙捐赠给协和医院的5部载物爬楼机，每部爬楼机高1米多，重达百斤。面对这批超大、超重的邮件，我主动请缨，和同事们一起送达后，协助医护人员将爬楼机放置在滑轮床架上。我想，我们多走一米、多送一程，医务人员就能省点时间、省点力气，去救治更多的病人。

战疫的70多天里，我每天不间断地往返于各大医院及医疗队驻地，累计出班160趟，执行紧急防疫物资投递工作5次，行车3000公里，投递邮件7000余件，医疗防疫物资及时妥投率达100%。

除了保证防疫物资的及时妥投，我还想方设法地满足辖区居民对生活物资的运送需求，每天行程超60公里，为近百户居民投递米面油、新鲜果蔬等物资。利用不多的休息时间，我还志愿承担了30余次其他区域居民生活物资的转运、投递任务。

2月9日中午12时，刚刚完成医疗防疫物资的紧急运输任务，还没有来得及吃上一口饭，我接到一位用户的电话，请我帮忙找一个邮件，说里面是给家里老人治疗心梗的药品。顾不上吃饭和休息，我放下电话就是一通忙活，在最短的时间里将救命药送到了用户家中。

“要不是你今天把米和菜送过来，家里就断炊了。”这是一位居民接过我投递的生活物资时说的话。平凡人家的烟火气，让我瞬间疲惫全消，那一刻我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分外值得，分外有意义。

2020年2月25日，我面对党旗举起右

手庄严宣誓，成为武汉市邮政分公司抗疫期间“火线入党”第一人。

（四）

干别人不能干的事，吃别人不能吃的苦，担别人不敢担的责，这就是成就美好人生的真谛。

这些年来，我获得了一系列荣誉，2020年9月获得“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称号、第四届“中国梦·邮政情寻找最美快递员”特别奖；2021年5月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第25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有人羡慕我年纪轻轻已获得如此多、如此高的荣誉，但我并不自满。党和国家给予我的荣誉属于全体邮政人，我只是适逢其会，作为代表出来领奖罢了。荣誉其实更多的是前进的动力和助燃剂，它激励我更加努力地坚持下去。

2021年春节期间，我与全国劳动模范熊桂林、全国邮政行业劳动模范李斯凡等邮政投递员，组成了爱心志愿小分队，前往偏远的江夏区舒安街，看望慰问生活困难的空巢老人与留守儿童，并为村民宣传自产自销的年货，帮助村民增收。

倾心邮路，一路播洒爱与希望。我捧着一颗心来，必将秉着这颗心坚定地走下去。

（徐龙：武汉市江岸区邮政分公司上海路揽投站投递员；白爱萍：武汉市总工会《武汉工运》编辑）

一名来自律师界老政协委员的体会

◇ 刘昌国

时间过得真快，我已连续担任四届武汉市政协委员了，其中两届为武汉市政协常委，作为已有20年政协委员经历的律师界委员，我确实有很多感想、感慨、遗憾和体会，现把它们总结起来，与广大的政协委员进行交流。

记得市委统战部的领导在对新政协委员进行培训时特别强调，政协委员既有权利，又有义务，既是荣誉，又是责任，要紧紧围绕着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围绕着老百姓关心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和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成为一名政协委员，是很不容易的，政协委员不是百里挑一，而是万里挑一。我每连任一届市政协委员，都感到要成为一个优秀的政协委员，是多么的不容易。

我作为从事律师工作的市政协委员，与来自其他岗位和界别的市政协委员相比，既有自身的优势和特点，又有自身的缺陷和困难。律师作为国家的法律工作者，所接受的教育和从事的工作，本身就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加之工作接触的领域多、人员面广，为我参政议政提供了天然的帮助。但是，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又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律师如果没有业务收入也就没有工资，从这个意义上讲，律师用于参政议政的时间都是可以直接与经济效益挂钩的，而要当好一名政协委员，每年需要用长达几十天的时间参政议政，这就对个人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但我认为，个人经济效益与政治效益、社会效益是密不可分的，而且不能凌驾其上。

同时，还要处理好责任和荣誉的关系，只有自己的责任履行到位了，才能有真正的荣誉。例如，我曾经针对老百姓普遍关心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进行过调研，发现看病贵是看病难的主要因素，而看病贵主要是因为药品经过的流通环节过多，各个医院自行采购，一些药品到医院后的价格是出厂价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为此，我于

2006年1月提出了《关于政府直接集中采购药品，切实解决“看病贵”问题的建议》的提案，建议通过政府直接集中向药厂招标投标进行采购，然后分发到各个医院，并在集中采购过程中引入监督机制，由物价、纪委、监察、卫健委、药监、工商等部门组成联合集中采购班子。随后，2008年我又提出“关于在我市积极推广和普及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零售药店的建议”，市政府有关部门采纳了该建议，当年仅武汉市第四医院就减少药品采购费用4000余万元，有效缓解了我市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又如，为把武汉打造成为教育强市，着力解决教育不公平问题，我通过认真调研，特别是在提案咨询活动现场，与时任武汉市教育局局长就我市高中“三限生”影响教育公平问题进行现场咨询后，提出了“关于政府进一步加大对教育的财政投入，取消在我市高中招生中实施多年的‘三限生’制度的建议”，也被政府有关部门采纳，受到媒体广泛关注并进行了大量报道。



刘昌国委员

为落实市委倡导的全民创业精神，着力解决我市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2008年12月，我提出了“关于在我市建立不动产、知识产权抵押制度的建议”。该建议被2009年武汉市政府工作报告吸收，有效地拓宽了我市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缓解了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为了改善我市的投资环境，建立高效的法治政府，提高政府依法行政的能力，我于2012年1月提出了“关于凡发生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的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或参加行政复议听证的建议”“关于我市两级法院选择有较大社会影响的案件和重大涉诉信访案件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观摩庭审、参加听证的建议”；2013年1月提出了“关于在我市海关、海事部门建立24小时受理报关和签证制度，改善我市软环境建设的建议”；2014年提出了“关于在我市各级行政机关普遍建立有偿聘请律师担任法律顾问，并将费用纳入财政预算制度的建议”，均被市政府有关部门采纳。

特别是在我提出“关于凡发生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的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或参加行政复议听证的建议”后，武汉市人民政府为此专门出台了规定，后又被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所采纳，并在第三条第三款中作了专门规定。

为推动长江经济带、武汉长江中游航运中心、湖北自贸区武汉片区的建设，我分别于2015年2月、2016年7月、2019年1月先后提出了“关于加强武汉长江中游航运中心服务体系建设的建议”“关于加快自贸区武汉片区服务体系建设，提高武汉对外开放水平的建议”和“关于助推自贸区武汉片区建设的建议”。提出充分发挥管辖全长江流域的海事局、海关、长航公安局、武汉海事法院、长江航道局、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均在武汉的优势，建立健全综合性的服务平台和服务场所，延长服务时间、加强多式联运、建立健全船东互保协会、将全球性的地区总部引进武汉，使武汉拥有直接签发多式联运提单的能力，提高和改善我市的投资软、硬环境。

为使人民群众在每个案件中都感到公平正义，2021年，我又围绕着反腐倡廉、公正司法，提出了“关于尽快在我市两级法院贯彻落实‘审判委员会讨论重大、疑难、复杂和是否应当再审的民事案件时，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列席制度’的建议”“关于在我市两级法院试行‘审判委员会讨论同级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拟宣告被告人无罪、拟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或者免于刑事处罚的刑事案件，邀请案件公诉人和辩护人向审判委员会进行陈述、接受询问的制度’的建议”。这些建议被法院采纳后，为改善我市的司法环境、维护司法公正，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除上述提案外，我还就加强法院的民主监督、市政管理、环境保护、税收等方面提出了诸多意见建议，也被有关部门采纳。

在每一次参加政协组织的视察、调研和专题协商活动前，我都会先对视察领域所涉及的专业知识、专业特点、取得的成绩、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学习和了解，争取做到议政议到点子上、帮忙而不添乱，但离党中央提出的“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

这些年来，我的有些建议被有关部门采纳，我深感荣幸。但获得肯定的前提是积极履职尽责，先要有为，有为才能有位。而要履好职尽好责，首先要勤于学习，拿出更多的时间进行调研，要真情为民，才能尽心履职。同时要立足自己的本职岗位，敬业做事，还要加强修身守纪，切实做到政治坚定、为人清正。虽然20年的参政议政经历对我的本职工作有一定的影响，但我无怨无悔。如果不是因为年龄原因，我还愿意继续为人民政协事业作出贡献。

上述仅是个人的一点体会，愿与其他委员共勉。

（刘昌国：十、十一届武汉市政协委员，十二、十三届武汉市政协常委，湖北省律师协会副会长，湖北华隽律师事务所荣誉主任）

提案线索就在你身边

◇ 陈荣华

从21世纪初开始，我当了10年的武汉市政协委员，感触良多。

从我成为一个新政协委员说起吧——与很多新委员不同的是，我的第一份提案就被列为大会发言，一发言就被媒体跟踪报道，所产生的社会效应持续发酵到现在。在武汉市政协，我这个普通的“平民”委员，一下子成为了“明星”委员。

这其中的奥妙就是我的委员“锦囊”：如果发现生活和工作中的共性问题，进行建设性的思考并提出解决办法，想通过政协内部适当方式反映到相关职能部门，就可以撰写社情民意信息；如果是针对具体一事提出具体可行的意见建议，并希望政府有关部门

办理，就可以撰写提案。核心是要找到“共性问题”，也就是有价值的提案线索。

怎样才能找到有价值的提案线索呢？结合我的亲身经历，主要有三招。

发现变化中的没变化

我的本职岗位在高三年级的讲台上。一次监考的过程中，同学们正在认真地做卷子，我突然发现教室前排有个男生的姿势很别扭，他驼着背，一条长腿伸到过道上，另一条腿横叉在课桌前。大大的书包放在课桌抽屉的下面，抽屉里塞满了各种试卷。哦，是课桌太矮了，这位身高1.8米的高三学生

两条腿根本放不下去，只好弯曲着身子写卷子。可怜的孩子，平时上课是怎么坐的？就一直是这么难受地将就着吗？我又仔细看了看其他的同学，那些身高正常的孩子都是如此将就着。

这是一个过去千百次在眼前出现的现象，但是又被千百次地漠然置之了。我的学生们大约也就“自然而然”地将就着，谁也没有觉得这是个问题。而当我意识到这是个问题的时候，就立即行动了起来。

首先，我和学生们一起确立了一个社会实践课题：“关于中小学课桌椅的现状”。先做横向调研，在随机抽样的几所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中，大家发现所有的课桌椅都是一个模板：一样的高矮，一样的大小，一样的样式。再做纵向调研，我们走访了相关教育设备单位，得知全国课桌椅的制作标准仍沿用的是20世纪50年代的规格，课桌抽屉底部离地面为57厘米，从来没有变化过。

接着，我和学生们一起分析原因，得出了以下答案：中国人的身高平均数在改革开放以前一直处于不太乐观的水平，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与之相应的是，中国人的身高水平有了较大提升。就高三男性学生而言，平均身高由改革开放前的1.60米左右，提高到改革开放以来的1.75米左右；同时，高三学生书包的平均重量，由改革开放前的8斤左右，增加到改革开放以来的25斤左右，并且还在不断增加中。

那么，怎样的课桌椅才能与学生健康成长的正常需求相适应呢？那段时间里，我和学生们只要有一点闲暇时间，就拿把卷尺东量量、西量量，在图纸上做设计、想对策。课桌的高度，从小学起，应该怎样逐渐升高，应该制定怎样的梯级标准；课桌的样式，应该有怎样的变化才能让学生的书包与大量的测试卷有安放的空间；座椅需要来一点什么变化，才可以让学生舒适地、无妨碍

地听讲、写作业。一路思考下来，把所有的意见一整理，归纳出了几条可被接受又具操作性的建议。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查阅了大量发达国家学校课桌椅配备的相关案例，以及坐姿与发育的大量医学资料，并与身边的教



2016年，陈荣华（左一）应邀在武汉市政协新委员培训班上作经验交流

师、领导作了无数次充分的讨论交流。后来的实践证明，我们这样做，客观上起到了所提建议既有理论支撑又有群众认同基础的效果。

在广泛调研中，我们了解到这样的问题需要政府教育部门解决，而有关部门解决这些问题可能还存在困难，比如需要政策支持、经费支持等等。所以在形成提案的过程中，我就上述问题拿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因为考虑得比较全面，该提案一立案，有关部门就立即进入了办理程序。

2003年的这份关于课桌椅的提案，是我成为政协委员的第一件提案，也是第一件成功的提案。记得当年这件提案在征求相关人士的意见时，有人就取笑道，别人都是就应试教育、公平教育等重大问题写提案，哪个提你这样简单的事情呢？再说，课桌椅怎么能算个问题呢？大家都是这样的，国家是有统一标准的。然而，令大家大跌眼镜的是，这份看似毫不起眼的提案得到了省、市教育部门和国家教育部、国务院的重视，得到了中央电视台的关注。后来我们看到，武汉市教育局牵头制订了梯级课桌椅制作标准，许多新建的教室里都给学生配备了书包柜、试卷架。

像这件提案一样，把身边正在发生的、很多时候多数人都熟视无睹的现象，捕捉到手，作为提案线索，加以调研、分析、思考、整理，就能够提出一件亮眼的提案来。

发现大事件背后的小问题

柴米油盐，酱醋酒茶，乃至衣食住行，都是民生必需。我们政协委员生活在市民中间，与市民呼吸相通、声气相闻。生活告诉我，一些突发的大事件背后，往往还

有好多小问题，而且有的小问题还有可能是大事件的导火索。善于发现这样的小问题，再深入地去了解、思考一下，手上就会有很有价值的提案线索了。

我的一位恩师，学富五车，身体健旺，可是在70多岁的时候，有一天走到马路中间的绿化带旁，被小车给撞倒了；我的一位同事的兄长，刚刚当上主任医师，有一次下班后走斑马线过马路的时候，被小车撞飞；我们小区前的一条主干道，在连接小区小路的十字路口，容易发生车祸，被居民称为“死亡路口”。这些令人痛心的车祸事件，都与两个小问题有关，一是有关斑马线的交通规则；一是随着主干道路面加宽，红绿灯的时长设置明显滞后，很不合理。

于是，我先后以“看到斑马线请缓行”“请添加斑马线”“请合理设置红绿灯时长”“背街小巷请安装路灯”等为案由，及时撰写了社情民意和相关提案提交上去。由于有关部门正好也在收集这一类问题，所以很快就有部门派专人前来咨询，并安排了日程让我有序跟进。当年年内，那个“死亡路口”画了斑马线，安装了红绿灯；与路口相接的那条背街小路也装上了路灯。至今10多年过去了，还有居民感恩：“我们记得，是有了你，才有了路灯。”在众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呼吁下，在各部门的通力协调合作下，如今斑马线功能的人性化被广大司机朋友所接受，看到斑马线就自觉缓行或停车礼让行人。看到这些发生在自己身边的变化，我真心觉得虽然做调研、写提案占用了自己好多休息时间，但是真的很值得。

2008年，汶川地震和雪灾这类意外灾害的发生，牵涉到了千千万万的家庭。我思考的是，如何在第一时间应对突发事件。

如果成立一个意外突发事件的应急办公室，有权限统筹指挥相关部门，迅速、紧急地启动应急预案，把灾害后果减到最小，那应该是市民乐于见到的。于是我抓住这一线索，转化为提案，该提案被及时立案并得到了办理，还被报送到全国政协。

我到现在还记得，当时有两个小伙子来到学校回复我这件提案的办理情况，并笑着告诉我市应急办已成立。后来我们看到，市应急办在启动应急预案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的疫情应急、洪涝灾害应急，都可以看到应急办从容的手笔。

发现提案线索征集中的亮点

我在撰写提案的过程中，有的提案线索是身边市民提供的，比如我提案中的水体污染问题、食品安全问题、校园霸凌问题、小区路灯问题、高架桥问题、黑板问题、水上义务救援团队的更衣室问题、退休教师待遇问题以及城市历史建筑保护问题，等等。

还有的提案线索是在广泛征集中发现的。民进武汉市委每年组织征集提案原案线索，征集有关武汉市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问题，人民群众普遍关注、亟待解决的热点难点问题，供政协委员参考。其中，有一条线索提到网瘾戒除机构的问题，我敏锐地觉察到：网瘾戒除机构存在于体制外，是否应该作为教育机构或企业而存在，应该有怎样的条例来加以制约和监督。当年我提交的这件提案，印象中好像没有立案，因为没有收到任何回复。如今我看到媒体披露的某些不法校外机构的猖獗罪行，深感痛心疾首。希望有政协委员能够对此发出强有力的呼吁，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线索都可以成为有价值的参考，还需要站在政协委员的立场，以建言者的担当情怀，从民生改善和城市建设等大局全盘进行思考，找出问题症结的亮点线索，拟出案由，深入开展实地调研，广泛查证，进行分析研究，提出建议，形成提案提交。

政协委员，是一个神圣的荣誉。其之所以神圣，是因为委员的使命担当。希望我这个老委员总结的这三招能给现任政协委员们一些启发，有助于大家把话说好、说到位，能有更多更好的提案造福民生，促进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发展。

（陈荣华：十、十一届武汉市政协委员，曾任武汉四中教师）

往昔数十年求学与任教的追思

◇ 刘宋川

我生于1938年9月，籍贯为湖北武穴市（原广济县）。1962年7月毕业于武汉师范学院（后改为湖北大学）中文系，随即留系任教，直至1999年退休。在二十来年的求学长途中，努力不懈，终于博得导师的指引，进入专业佳境。在三十七八年的教师生涯中，获有教学和科研的业绩。现在以耄耋之年坦然回顾往事，认为是成功和失误相兼，满意和遗憾间杂。成功的原因，一是生逢盛世，幸遇良师；二是笃志求学，虚心问学，精心教学，遂心学报，潜心治学。今将有关回忆选录如下。

笃志求学

从1945年至1949年，我在私塾读书，接受了古代诗文的启蒙教育。1950年年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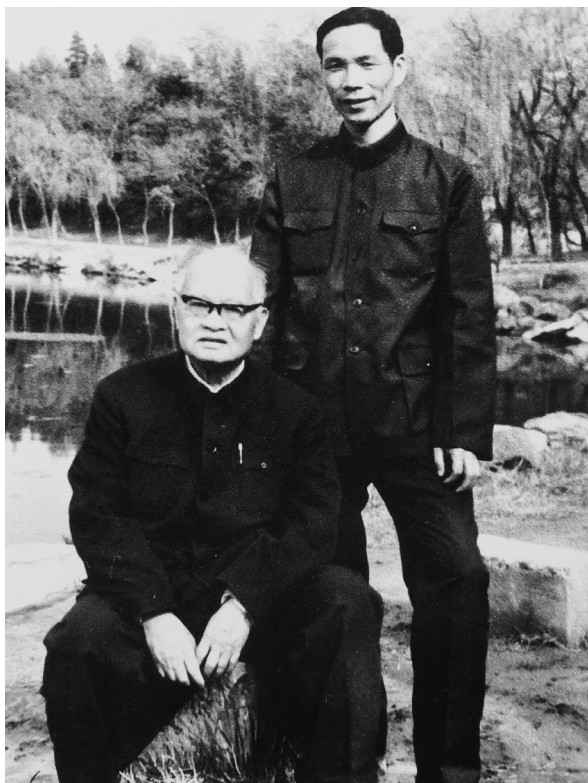
家乡广济县已解放数月，私塾关门，政府开办了小学和中学。父亲叫我相随务农，我却暗自下决心，一定要读书升学。我一面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儿，一面在读了初中的堂叔指导下补习算术。到了1951年年初，终于得到父亲的同意，前往龙坪镇小学报考五年级，当即被录取入学。

在小学阶段的三个学期中，由于我刻苦学习，各门课程的考试都获得优异成绩，全班排名第一，使同学们十分惊异。在广济初级中学学习期间，我第一学期各门课程总成绩在全年级七个班中排名第二，后来五个学期都是排名第一，由此获得了一个“尖子”的外号。

高中阶段我就读于黄石市第一中学。在1958年5月即将毕业之际，学校领导依据上级新规定，将一些品学兼优的学生保送

至北大、清华等名校读本科，我获得保送上北大中文系读书的资格。但是未曾料到这一宿愿不久即告吹。原来此时学校恰巧收到乡间一封来信，说是“刘宋川在1957年暑假回乡时不参加农业劳动，还瞧不起农村干部”。事实是，我当年暑假回乡在队长安排下参加了20来天的劳动，记有20多个工分，返校时还把生产队的证明交给了班主任。至于瞧不起农村干部云云，更是莫须有。而学校有关领导当时对此不加调查核实，就断然取消了我原定的保送资格。这是我在求学之路上未曾料到的挫折。

高考以后，尽管我的分数都很高（后来得知），却只能被刚刚设立本科的武汉师范学院录取。父亲终于开口，说是黄石市大冶钢铁厂正在招工，希望我去报名当工人。我深知，家乡的农民都对钢铁工人很羡慕。



1980年春，王力先生（左）和刘宋川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合影

但是我自甘清淡，准备将来去当中学教师。父亲只好作罢。

1958～1962年，我在武汉师院中文系学习。四年中各门课程考试成绩都是优异，其中现代汉语、逻辑学成绩名列第一，古代文学成绩与四班同学郑在寅并列第一。于是毕业后留系任教，分在汉语教研室工作。在教学和自学中，逐渐积淀了语言知识理论上的疑难，感到问学无门，前路茫然。

未料到天从人愿，绝处逢春。1975年暑假，武师中文系总支书记高金华同志应《光明日报》史学编辑之约，安排王陆才老师和我合写一篇长文《论霍光》，我们持初稿上京到光明日报社商讨修改发表事宜。其间利用空隙游访北京大学，看到了北大中文系正要开办各专业进修班并立即招生的广告。我眼前一亮，连忙向在场的主管古代汉语进修班招生工作的赵克勤老师询问有关事宜，又做了自我介绍。赵老师对我十分满意，当即予以报名登记。回校后果然收到北大进修通知，又获得本校领导批准。

从1975年10月至1977年春（中间不放寒暑假），我在北大古代汉语进修班学习。任务有二：一是听课学习。由王力、郭锡良、唐作藩诸师以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为底本，用数百学时讲解文选、通论和常用词，中间还插入答疑和讨论。二是参与新教材《古代汉语》的筹划和编写工作。两年后我迅速提高了上古文献的阅读能力，对古代汉语的理论知识有了较全面深入的理解，并具有自主主讲古代汉语课程的能力。

1978年春，国家教育走上正轨。王力师与郭锡良师分别来信告知，希望我报考他们的研究生。武师领导只同意我再上北大进修两年。于是我再次上北大中文系进修，完成了以下学习和工作任务：一是与汉语史研

究生一起听课，学习了王力、周祖谟、朱德熙、郭锡良、唐作藩、裘锡圭、陆俭明、叶蜚声诸位名师主讲的课程。二是在北大中文系用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教材给本科生主讲了两轮必修课。三是给王力师做助手工作。四是在王、郭二师指导下写出两篇专业论文。

郭锡良师对我这次进修作了如下鉴定：“两年来刘宋川学习刻苦认真，……撰写出两篇有创见的论文，具有独立进行科研的能力。主讲古代汉语必修课，教学效果良好，深受学生欢迎，得到系领导和教研室的表扬。”王力先生写道：“……特别是音韵学方面，他研究得比较深入，他已达到相当高的学术水平。”中文系副主任朱德熙先生在我前来领取进修结业证时说：“你的确与众不同，一是‘二进宫’（指两次来北大进修）；二是做了王先生助手，深得他的认可赏识；三是以地方高校教师资格在北大主讲两学年必修课，站稳了讲台；四是听说你写了有见解的专业论文。看来，你是第一个在我系露了头角的进修生。”

虚心问学

我能在学业上不断进步，是因为每每幸遇良师，自己又能勤于问学，得到他们的谆谆教诲。

高中三年，因为得到语文老师邹乃文课后多次的辅导，我的写作能力得到明显提升。邹先生文学功底深厚，旧体诗、白话诗都写得很好，我读过他的诗稿。他多次利用星期天给我讲解唐诗，说明古体诗和格律诗在体制上的区别，五七言律绝的平仄规则；还指导我阅读郭沫若、艾青、贺敬之等名家的白话诗。于是我写了旧体诗和白话诗的习

作，呈交邹先生批改。1957年春夏，黄石一中开展“五四”征文竞赛活动。我写了《故乡辞行》和《给故乡青年》两首白话诗，参与评奖。《辞行》诗第一节是：“村巷口亲邻来慰勉，村脚下河水在叮咛。青石桥伸臂铺前路，大樟树撑伞给送行。”这两首诗被高中语文老师一致评为征文竞赛第一名，获一等奖，由此引起领导重视，为毕业时保送上北京大学读书垫起了台阶。

本科在读期间，校领导要为中文系培养和组建青年教师队伍，决定从一年级六个班中抽调20多名学生分别进入各学科教研室学习。我被调入汉语教研室，除了回班与同学一起上课听讲并参加考试外，其余时间我都在教研室内与老师相处，接受指导。或温习功课，或阅读有关专业书籍，再请老师答疑。首先是接受了教研室主任李行夫先生的长期指教。李先生能讲一口流利标准的普通话，主讲现代汉语语音。他发现我的广济方音不利于将来课堂教学，就主动要求我接受普通话口齿训练，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李先生教我按照普通话声韵调的表格来逐一发音，并予以辨正纠偏。然后亲自为我朗读《人民日报》的长文和名家的白话诗，让我静听，再让我模仿练习。这种传授从1959年一直坚持到1964年。后来我能讲比较标准的普通话，皆得益于李先生的口讲指授。汉语教研室中还有教现代汉语语法的顾静如先生、教逻辑学的李先焜先生，也对我多有点拨启示。

1975年秋，我上北大古代汉语进修班学习，立即拜见古代汉语教研室副主任且实际主持工作的郭锡良先生。郭师在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叫我前去闲谈，我如实汇报自己在武师的语言学习和语言教学工作情况。郭师直言相告：“我国语法学界存在两个体系：

一个叫教学语法，是张志公先生主持拟定的，全称是‘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在中学和师范院校中广泛采用。它兼采众说，规范性、实用性强。你所学的现代汉语语法知识就属于这个系统。它的特点是采用句子成分分析法，又叫中心词分析法。分析句子结构时，先找出主语和谓语两个中心词，再找出主语、谓语的附加语（定、状、补和宾语）。这种分析方法存在问题较多，不细说了。你要在理论上弄明白。”郭师又说：“另一个叫专家语法（又叫科学语法）。北大中文系的语法教学是属于这个体系。北大现代汉语语法教材基本上是按照朱德熙先生的观点编写的，《古代汉语》教材是王力先生依据自己的理论体系主编的。朱先生和王先生在语法上都主张结构层次分析法（直接成分分析法），与你所学的中心词分析法是不同的语法体系。你需要换脑筋，按照进修班的教学安排，重新学习，接受新的理论和方法，逐步成材，以便将来你能独力担任语言教学任务，独力进行语法研究。”

听了郭师的肺腑之言，我心中豁然开朗，明确了此后学习的目标和道路，真有“闻师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感觉。后半夜回到宿舍，默吟小诗为记，题目是《听锡良师一夕长谈》：“法门师晓答，窗月侧听迷。历数诸家论，星光转曙晖。”在北大四年中，我与王力先生相处时间最长。前两年王先生来进修班上课，都是我身为班长，负责接送。因为接触频繁，逐渐引起王力师的更加关注亲炙。1976年9月初旬，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北大中文系各专业师生都自办墙报表示哀悼。我奉郭锡良师之命为语言专业主办墙报，把老师们的诗作依次编排，用中楷毛笔字写在白纸上，再贴在围墙上，引来广大师生的观看和评议。古代文学教研室的倪其

心先生对署名为“浩川”的一首七律诗十分推许，认为是中文系墙报中最好的诗作。全诗是：

瞻仰毛主席遗容泣赋

浩川

破空悲曲神州震，一柱苍松卧翠丛。
岂意清秋停健步，仍疑神采动慈容。
光辉长照芙蓉国，思想高连马列峰。
回首凝眸挥泪雨，中华儿女永朝东。

许多师生也都赞同倪先生的观感。倪先生又告知前来观看的王力先生。王先生看后，点头称是，只是也不知作者是谁。几天后我来先生家中接他去上课，先生问及此事，我只好承认作者是自己。先生凝视着我说：“这首诗文情并茂，真实感人，不同众作。你有这样的旧体诗功底，我很高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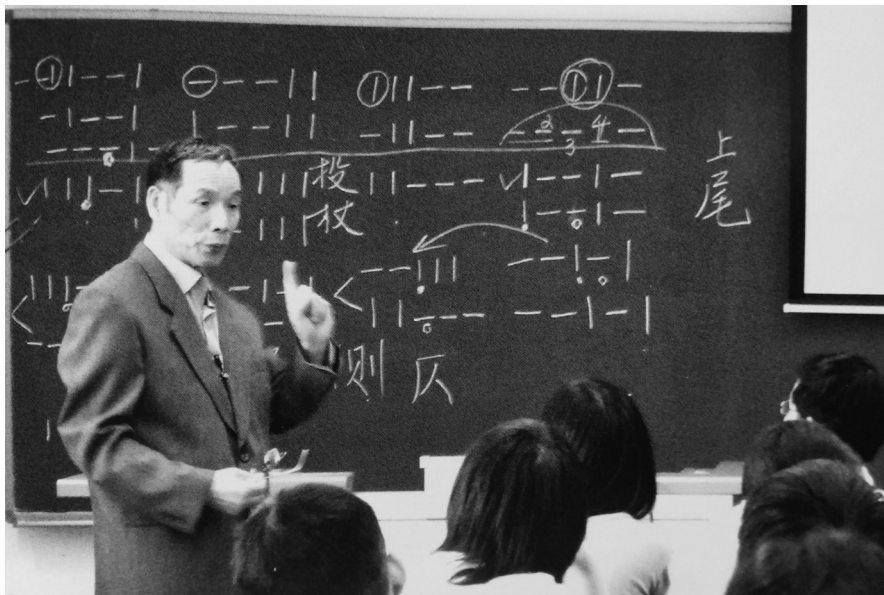
不久，郭锡良师又与王先生商量，请王先生不辞辛劳，在家中单独给我讲解音韵学和汉语语音史，王先生爽快地答应了。从1976年10月中旬至1977年元月底，王先生在他家中小书房给我讲了14次课，每次都在星期三下午。师生相对坐在写字台前，先生以自己的著作《汉语音韵》和《汉语史稿》（上册）为据，有条不紊地口述其中的要点。我用心听讲，及时笔录，较快地弄懂了书中的内容，为后来做王先生的助手培养了能力。

果然，1978年秋我第二次来北大进修不久，王力师对我说：“以你现在的学业功力，可以给我当助手了。如果你学校领导同意，就调来正式当助手；如果不同意，就一些助手工作。”于是我就做了王先生的临时助手。此后，我除了自己听课和讲课，其余期间大多出入于王力师工作室和学校图书馆。我每天看见先生写作论著时，一不做资料卡片，二不查阅文献，三不先打草稿，而

是直接在方格稿纸上奋笔疾书，一气呵成。于是我忍不住发问：“先生写论文和著作，总是速度惊人，这有什么诀窍吗？”王力师说：“我写论文或著作，先暗有一个或长或短的酝酿过程。一是先要查阅重要文献，古人能够过目不忘，我能做到注目不忘，充分占有材料。二是运用科学的头脑给著作归纳出纲领，给论文列出

要点，做到烂熟于心，打好腹稿，因此论述有条不紊，不需打草稿。这就是人们说我会搭架子的功夫。三是文思通畅，下笔成章，这是我的写作基本功。这算不算诀窍？”我事后细想：王先生是天才，我要学习天才勤奋用功、刻苦治学的精神，而不要痴想获得非凡的学术捷径。

1979年春夏之交的一个早晨，我陪同王力师到北大未名湖畔闲步。先生说：“你条件已经具备，现在应该考虑写论文的事了。”我回答：“正在酝酿论题。”先生说：“既然如此，我有两点提醒你：一是选题要适中，易于全面掌握语料，便于周密进行论证，结论就能成立，甚至会有新见。要明白：小题大做是可取的，大题小作是失败的。二是‘例不十，法不立’。这是黎锦熙先生说的，我很赞同。例证不足，易犯孤证的毛病，结论就站不住脚。”王先生的一番提示使我茅塞顿开，于是回去写了小诗以作纪念。题为《奉陪王力师闲步北大未名湖畔》：“玉塔亭亭挂曙晖，小桥一语启心扉。未名湖畔青青草，随送师生健步归。”



2009年春，刘宋川应邀到北京大学中文系作学术报告

精心教学

我的教学生涯可分为两个阶段：从1962年8月毕业留系任教至1977年年底为第一阶段。专业方向已由领导确定为古代汉语，并以助教资历担任古代汉语教学辅导，又先后数次担任几门课程的主讲工作。1965年春夏，我被派往武汉市教师进修学院，主讲文字学概要，听讲人是进修的中学教师。其中，我根据自己的研究，归纳出汉字简化的条例，使他们明白了汉字简化的主要规律，进而纠正以往犯有自由简化的毛病。所以我在讲课结束时，赢得他们全体起立鼓掌。1965年至1966年，学校领导安排我参与越南留学生教学工作，主讲一个班的现代汉语。其间北京语言学院（即今北京语言大学）教学巡视组来我校听课，对三位主讲教师的教学作了评议，特别对我的讲授加以推许。主要是认为我能采用当时《人民日报》关于越南军民反美斗争的新闻材料，再按照语言学院所编教材中各节的汉语语

法要点来编写出许多新例句，在讲课中用以举证说明，避免了照本宣科的枯燥毛病，又激发了越南留学生的学习热情。1972年秋，武师中文系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入学。我被调入古代文学教研组，在后两学年中担任两轮汉唐诗歌的主讲。我用深入浅出的语言讲解诗句原意，使学生既能读懂诗章的原意，又能理解作品的思想意义和艺术特色，教学成效显著。

1977年冬，中文系领导根据我十多年来的教学业绩，批准我在职称上由助教晋升为讲师。此后十来年，又依次评为副教授、教授。

1980年秋，我回到武师，给中文系78级、79级学生主讲古代汉语，成了中文系第一个独力全面地采用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教材来讲课的教师，也是此后二十年中给本科生讲古代汉语基础课次数最多的教师。1986年开始招收汉语史研究生。我又先后开设和主讲了专业课《汉语音韵》《汉语语法史》和选修课《左传、史记作品选讲》等课程。在教学上精心准备，认真负责，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深受学生欢迎，被他们捧为名师。我上课的特点是：其一，掌握教材中文选、常用词和通论三部分相结合而以文选为纲的特点进行教学，使学生较快地提高了阅读古文的能力，同时获得古汉语词义和语法等方面的知识。其二，在语法方面，根据自己的研究，对教材做了适当补充，丰富了教材通论的内容，使学生具有新鲜感，进一步丰富了知识。其三，布置课后的书面作业次数较多，份量较重，其中以词义和语法内容为重点。练习批改之后发还学生，再安排辅导时间与学生讨论作答。其四，学生认为我讲课音正腔圆，说理透辟，明白好懂，使他们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其五，授

课之外，我又引导胡真、孙玉文、吴辛丑等五六个同学参加业余自学活动，指导他们阅读参考资料，解答有关疑难，使他们逐步各有所专。后来考入北大中文系深造、并相继留在古代汉语教研室任教的就有三位：孙玉文、刘子瑜，博导；宋亚云，中文系副主任。他们都是经过我讲授引导的学生，他们的业绩足以让我感到心满意足了。

遂心学报

1988年春，我在继续担任教学工作的同时，被校领导调往学报编辑部担任副主编；不久即改任常务副主编，主持学报工作。根据学报的工作情况，我采取了如下措施：

第一，先后从本校和武大、华师引进毕业生来学报编辑部当编辑，使编辑部处理稿件的能力得以全面提高。第二，规定来稿（包括内稿和外稿）必须经过所请专家审阅，其中内稿必须外审。如专家判定稿件达到学术质量标准，则再由责任编辑处理，报请常务副主编认可，才能刊用。第三，我约请全国重点高校，如武汉大学以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名校的科研处寄来有关审稿专家名单，然后分发给责任编辑，供他们选择送审。第四，专家审稿时，先依据文科、理科稿件审阅意见表逐栏作出判定，再写出具体意见。我依据自己对专业学术论文的认知，编列出文科和理科论文两种审稿意见表。其中文科表中列有“论题价值、研究方法、材料运用、论证逻辑、基本结论、论文效用、质量等级”等栏目，显示了文科论文应有的基本要素和特点。每个栏目内又依质量水平分为四个级差，一、二、三等分别表示优秀、良好、基本合格，第四等则为不合格。每个栏目的

等级又各有一句准确扼要的文字表述，供审稿专家理解，便于判定，并将稿件有关质量一一对号入座。

北京大学哲学系著名学者楼宇烈教授多次应邀审稿。后来寄还已审的稿件并附信给我说：“贵校学报所言审稿要求和所列审稿表显示了你的学术见识。表格所列条目准确鲜明，很有创意，北大学报还没有这样做。我为你这位北大校友高兴。”

由于采取了以上的革新措施，学报编辑部终于革除了以往不严格审稿而暗中凭借人际关系用稿的弊端，论文质量得以明显提高。根据外校有关资料统计，湖大文科学报论文质量后来连续四年（1992~1995年）排名进入全国综合性大学的前十名。我的八年学报工作终于达到了校领导的要求，自己也遂心如愿了。因此再三请求离任，终于得到校领导批准，于1996年春回到中文系任教。

潜心治学

我回系之后，依旧担任本未间断的古代汉语本科教学和指导汉语史研究生的专业教学工作。不过毕竟放下了学报的工作重担，使我得以挤出时日来重新进行长期搁浅的汉语史学术研究。

我的学术研究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直接为教学服务。1972年以后数年，参加了古代文学的教学。为满足讲课需要，写了约30篇古代诗文论析，有十几篇分别收入王陆才先生主编的《古代作品选讲》和《古代作品讲析》两书，先后于1974年、1979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20世纪80年代初，我写了《古代诗文详解》一书（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目的是纠正中学课本注释的某些失误，给中学生和教师释疑解难。王

力先生翻阅了注释书稿，连忙为此书题写书名。21世纪初，我又写有《古代汉语自学辅导》一书（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为高等教育自考生释疑解难。1987~1992年，我参加郭锡良、李玲璞主编的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材《古代汉语》的编写，是主要撰稿人之一。

第二类是汉语史问题研究。从1979年直至2019年的40年中，我大约发表了40篇论文，现在已经收集到的有35篇。内容包括文学、音韵、词义、语法以及诗律、唐诗字音平仄等方面。在语法方面，有数篇长文显示了独到见解，如《先秦双宾语结构考察》《“名·之·动/形”结构再探讨》等，先后得到王力、朱德熙、郭锡良诸师的推许和学界的公认，补充和修正了前辈的结论。

退休之后，我用三年时间通读了《全唐诗》正编（平装二十五册）和《续编》，发现诗中许多常用字有平仄（上、去、入）两读而意义或异或同的特点。搜录之后，计有300来个单字。分析这些字音字义，对于准确解读唐诗、分辨唐诗声律、判定体裁会有很大帮助。于是与女儿刘子瑜教授合作，把唐诗音义分成八种情况进行论析，成文之后，相继发表。论证的结果又可以弥补、纠正《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和新版《辞源》等大型工具书在字音、字义注释方面的疏漏或失误。

现在，女儿刘子瑜教授选录我的论文汇集成书出版，年高德劭的郭锡良先生特为作序，使我感愧交加，深知虽在耄耋之年，惟有在研究之路继续前行，孜孜以求，才不负先生的勉励和盛世的关怀。

（刘宋川：湖北大学中文系教授，八、九届武汉市政协委员）

大集学校的那些人和事

◇ 周 敏

转眼又到开学季。想着6岁的侄儿即将步入学堂，成为一名小学生，我不由得想起40多年前的自己。

我的小学时光是在汉阳县（今蔡甸区）大集学校度过的。那里的5年，是我人生中最无忧无虑的5年，记忆至今挥之不去。

（一）

20世纪70年代末，正值粉碎“四人帮”不久，国家百废待兴，教育尤甚。很多地方基层教育设施简陋，师资力量有限，一些乡村小学甚至借用当地的祠堂作为校舍。但大集学校条件较好，这主要是由于大集场是个中心大镇，各方面的基础还是比较好的。大集学校不光有小学，还有初中，类似现在的九年一贯制学校。那里没有围墙，是开放式的，校舍布局就像一个超大的四合院，最

里一排是学校办公室和部分教师宿舍，“左厢房”是小学高年级教室，“右厢房”是初中教室，最前面和办公室平行的是地势更高的小学一二年级教室，四方中间是一个大操场，足有三四个篮球场大。课间10分钟，这里是学生们锻炼身体、调节精神、尽情欢乐的好地方。

记得报名上学时，说是要考试，考上了才能上学。对于我们这些六七岁的孩子来说，哪里知道考试为何物。好在都是大集场的人，相互熟悉得很，有人介绍了考试的形式——写1、2、3、4、5……或是写自己的名字，最难的就是1+1、1+2了。于是家长们突击培训自己的孩子。记得我报名时，老师拿出本子叫我写上自己的名字，我歪歪扭扭地写完后，老师说了声：“嗯，不错，可以上学了。”

我依稀记得刚上学时的情景。我们

四五十个小朋友老老实实在各自的座位上，懵懵懂懂地听着一位年轻的女老师宣布课堂纪律——上课要认真听讲，不许说话；要打背手，坐好……窗外，趴着不少脑袋，有不放心的家长，有看新奇的高年级学生。邻居家的小姐姐读三年级，她也来看，后来告诉我，我们的老师叫叶富珍，是个蛮“狠”的老师。第二天早上，我们按老师的要求坐好，刚要上课，就听见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喊声从门外传来，只见一个小女孩被一个高个子女人推进了教室，刚一转身，小女孩掉头就抱住她的腿，“妈妈，妈妈”哭嚎个不停。女人也不做声，掰开她的手，再次把她推了进来。那小女孩也执拗得很，再次跑到门边抱住女人的腿，就是不进教室。如此反复了多次，小胳膊终究拗不过大人的腿，女孩还是被推进了教室。后来才知道，那高个子女人是学校的副校长，所以那小女孩比我们晚一天还能进教室上学。虽然闹了这么一出，但她上学后成绩很好，听说后来考进了中南财经大学，不知她是否还记得自己上学第一天的窘态。

我们最初的课程只有两门：语文和算术。叶富珍老师是我的第一位老师，一共教了我三年，给人印象深刻。她那时只有二十五六岁吧，梳着一条大辫子，个性爽快又不失女性的柔美。她既是我们一二年级的语文老师，也是算术老师，到了三年级，叶老师仍然教我们语文。

刚上学时，语文主要是学汉语拼音、识字，然后才是组词、造句。每天不是“a、o、e、i、u、ü”，就是“点、横、竖、撇、捺”，再就是“人，人民的人”“大，大小的大”“山，山水的山”……伴随着叶老师手里的教鞭打在黑板上“啪啪”响，我们齐声朗读上面的拼音和汉字。

大概是在三年级，我学到了人生中最初的两首唐诗，李白的《早发白帝城》和杜甫的《绝句》。我们跟着老师朗读：“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李白的这首诗空灵飞动，自然天成，字里行间流淌的满是豪情和欢悦、悠扬和轻快。我一下就喜欢上了李白和他诗文的风格。先入为主的力量很强大，童年的感触真的能影响人的一生。其实后面杜甫的那首诗也是经典：“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全诗一句一景，动静结合，清新生动，对仗工整，可谓辞工句丽。只是当时一直搞不懂“绝句”是什么意思，老师说那就是诗的名字，我心里还纳闷：这个名字好奇怪啊！

作文也是从三年级才开始学习的。整个小学阶段都是学写记叙文。叶老师教我们，写记叙文要把握“四要素”：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事件要表述清楚起因、过程和结果。最简单的往往是最管用的，直到今天，我们写大多数文章，都要把握时间、地点、人物、事件。那时，有的同学对作文很头疼，但作文对于我来说，却一直是引以为傲的，我的作文经常被当做范文在班上朗读。老师教的什么描写、衬托、伏笔、铺垫等手法，什么比喻、拟人、排比、对偶等修辞，我一学就会，在写作中用得活灵活现，还有什么以小见大、欲扬先抑、借景抒情、首尾呼应等，我运用起来得心应手。叶老师批改作文时，会在她认为写得精彩的段落或句子下面划上红色的波浪线。每次本子发下来，我的作文下面经常会有一条一条的红色波浪线，让我心里美滋滋的。这大概得益于我从小阅读比较广泛、比较用心的缘故吧。记得有一次，我看一本小人书，里面有一句短语“说

时迟，那时快”，虽然没学过，但意思搞懂了。期中考试写作文时，我要描写一段动作，就学着用这句话，但一下子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最后就写成“说时长，那时短”，是这个意思嘛！没想到，叶老师竟然认可了，说我写得很生动。就这样日积月累，对作文大有裨益，正应了那句话“得法于课内，得益于课外”。

算术课先是学阿拉伯数字，然后是10以内的加减法，接着是进位、退位。有一位同学被叶老师点名在黑板上写“2”，写完全班大笑：“好像个鸭子啊！”学加减法时，为了不出错，一些同学趁夏天上街捡冰棒棍子，上学时带着，遇到了几加几、几减几，就拿出来数。后来，算术越来越难了，连名字都改了，变成了“数学”。到了学解方程的时候，我们有些奇怪，方程不是跳的吗（我们把跳房子叫跳方城），怎么成了数学题啊？

叶老师在学习上对我们要求很严格。每天教的生字，她都要在作业本上进行听写，还会随时点人到黑板上听写，不仅字要写对，笔画顺序也不能错。这搞得我有点紧张，生怕哪个字写错了当众出丑。教过的课文，她也要检查，看我们读得是否通顺、流利，是否有错别字。她还有一条规定：我们每天早自习要大声朗读课文，她不拍手叫停就不许停。于是，每天一早到校后，我们几十人各自放声朗读，抑扬顿挫，声如波涛，场面热闹。可时间一长，就读得口干舌燥，有点受不了了。心里虽想着老师怎么还不拍手啊，口里却丝毫不敢懈怠。后来才体会到，放声朗读有利于培养语感、增强记忆、加深对课文的理解、领略语言文字的魅力，好处多多。叶老师还要求我们组织学习小组，按照住处分片，六七个邻近的同学一组，星期天就在组长家里学习，一般是巩固语文、

算术的课堂知识，还有相互督促完成作业。学习小组一点也不含糊，也是要排排坐的，就像个小课堂。记得有一次，一个男生不知是因为一个问题没答上来还是作业没完成，被批评得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

课堂下的叶老师又是很随和的。她的性格比较开朗，年纪也不大，在老师中很引人注目。她气场很足，是那种严格而不严苛的老师。不记得那时有没有班主任的说法，反正我们这个班被她“包”了，被她带得风生水起。叶老师还会充分发挥学生的作用，时不时地把班上成绩好的同学（大多是班干部）叫到办公室去布置工作，最近要做什么，注意什么，哪个同学要帮助一下，等等，偶尔也会给我们开开小灶。一次，她带着我们五六个同学刚走到办公室门口，教音乐的涂老师老远就喊：“小叶，这些都是尖子吧？”叶老师哈哈大笑：“么事尖子啊，杪子（即树梢）哦！”后来，叶老师作为骨干老师参加了汉阳县组织的短期师范培训，到武汉学习，回来后大辫子变成了时髦的“大波浪”，洋气多了。学校的老师都打趣她，学生也都喜欢多看她两眼。

（二）

语文、算术是主课，后来慢慢增加了其他科目——音乐、图画、体育、劳动，等等。我们接触的老师也多了起来。

音乐课就是唱歌，不识谱，老师教一句我们唱一句。教音乐的涂老师40多岁，在学校格外引人注目，一是因为他和其他老师的口音不一样，他操一口汉腔，应该是地道的武汉人，不知怎么到了我们这个公社学校；二是他的头特别大，大集场的人揶揄他到剃头铺剃头（理发）时，师傅会多收他一

倍的钱，也不知是真是假。涂老师多才多艺，手风琴、钢琴样样拿手，还是一口醇厚的男中音，什么《王二小》《读书郎》《八月十五月儿圆》，都是他教我们的，一般一堂课教一首，都是短小简单易学的歌。学校的条件还不错，居然有一架旧钢琴，但平时一般用的是手风琴，钢琴只在期中和期末考试的时候用。哪个班哪天要考试了，老师们就把钢琴抬到哪个班里去。考试的时候，全班同学一个一个轮流上去唱，自主选歌，笑眯眯的涂老师当场打分，真正的公开、公平、公正。记得有一次，一位女同学唱了一首《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欢乐的歌声，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当时我们听得目瞪口呆，这首歌从没听过，觉得好长好复杂哟，但是真好听啊！顿时对她佩服得不得了。后来得知，这首歌是她跟高年级的姐姐学会的。

体育课是我们最喜欢上的课。体育老师姓姜，30多岁，个子不高，很精壮，是个既严格又极具亲和力的老师。体育课主要在学校中间的大操场上，以玩为主，但体育课的玩也是有规矩、讲纪律的，尤其是不能疯闹、不能影响其他班级同学上课。对此，姜老师是毫不含糊的。我们玩的比较多的有跑步、跳远、跳高、跳绳。学校办公室后面还有一个操场，这里安放了双杠和爬杆。双杠不是随便玩的，姜老师教我们做了几个简单的动作——上杠、甩几下、

下杠，要一气呵成。爬杆大概有八九米高，女生不太敢玩，男生才玩。后来升级了，姜老师也让我们玩玩篮球，但玩的最多的是乒乓球。那时候，学校里打乒乓球成风，球台根本不够用。课间10分钟，哪个班先下课了，就会飞一般地跑去把球台“霸占”起来，我们更多时候是在体育课上排队过过瘾，再就是回家后把门板下了，人少就捉队厮杀，人多就玩一种叫“大小王”的乒乓球游戏。后来，港台的武打录像流行起来，大集场一下子学武成风，大大小小的孩子都跟一个姓杨的老拳师学拳。每天放学后，五六十个孩子在稻场（翻晒、碾轧稻谷的场地）上纵列排开，有模有样地比划着。这股风也吹进了学校，姜老师在体育课上竟教了我们一套简单的棍术。棍子是自备的，那段日子我们上学的时候，肩上除了书包，还人人一根长短不一、粗细各异的木棍，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样子。上课的时候，几十个男孩女孩踏着弓箭步，将木棍举过头顶，姜老师手里的棍子在我们头顶上一路“啪啪”地敲下来，口里大声喝道：“站稳！”“用劲！”我们情绪高昂，在姜老师的带领下，压、挑、挡、拨……认真得很。后来，学校又来了一位体



20世纪80年代初，大集学校三好学生留影，二排右一为作者

育老师，姜老师教上了数学。新老师是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好像是科班出身，上课蛮威严，我们都有点怕他。但他对我们却看不上眼，老说小学生不适合他教。不到一学期，他就调走了，亲和的姜老师又成了我们的体育老师。

劳动课每周一次，好像是在周末下午，老师一般组织全班做卫生，有时是全校大扫除。好几百名学生一起出动，端水、扫地、抹课桌、擦玻璃……各班除了管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外，还有分派的任务，有的是扫操场，有的是清扫厕所，有的是清理杂物。劳动课也是要记成绩的，老师会根据每个人在大扫除中的表现和平时值日的情况来打分。值日其实就是每天放学后做卫生，扫地、抹桌子。刚开始时是以组为单位，轮流值日，到了高年级，就是同桌值日，每天两个人。班上只有笤帚、抹布。轮到自己值日了，上学时就要带上脸盆，端水用的。扫地不能瞎扫，要先洒上水，不能多也不能少，既不能使灰尘四起，也不能让污水流淌。做完卫生后，还要喊清洁委员来检查，完了才能回家。所以班上选的清洁委员一般都住在学校旁边，方便检查。他会认真地在本子上记上“清洁”或是“不清洁”。若是“不清洁”，第二天就要重做。有一段时间，学校号召勤工俭学，全校学生都去收废纸破烂，我们上学时几乎人手一支细铁钎，看见废纸就一插，积少成多，每个人、每个班的斤两都是要记录的，这也是劳动表现的一部分。还有一次劳动课，叶老师带全班同学到叶湾（她家所在的村子）帮农民拾稻穗。稻田刚刚收割过，地里散落着一根根的稻穗。我们兴致高涨，边拾边玩，干得热火朝天。湾里的小队长还过来看，频频点头。最后，拾拢的稻穗竟然捆了一两堆。全班同学都得到了奖励——

人一个白萝卜。回想起来，这种劳动实践真是不错，既让小孩得到了劳动锻炼，又灌输了节约粮食、颗粒归仓的思想。

还有几门很特殊的课——写字课、自然课、故事课。这几门课开的时间都很短，最多一个学期就没有了。写字课是一位姓张的老师教的，40多岁，人长得非常粗糙，却写得一手好字，他板书的宋体字犹如从报纸上抠下来的。有一段时间，他还要求我们买大字本和大字笔，教我们学习写大字（即毛笔字），可惜没有坚持下来。自然课讲的都是些最基本的自然常识，天文气象、山河地理，其实就是科普课，考完了就停了。印象较深的是考完后老师发卷子的情景。这位老师与众不同，我们一个个被他点名上前拿卷子——“××，90。”“××，95。”“××，98。”他不是随便报着分数，而是用一种朗诵般的语调，时不时地还“啧啧”几声，同时向学生投去一个个赞许的眼神。这位老师一定学过心理学。要放假了，快过年了，考得也好，教室里一片愉悦。故事课现在闻所未闻，但我们那时确实有这一门。这是最轻松的一门课，没有考试，上课就是听老师讲故事。一般是教体育的姜老师来上课，他不带课夹，开口就是“我今天讲个×××的故事”，下面便安静得不得了。我们听得最多的是破案的故事，都惊叹他怎么知道那么多的故事。

（三）

说到课间10分钟，那可是我们最向往的时刻。下课铃声一响，老师不说“下课”，大家虽然不敢动，但已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了；老师一说“下课”，我们便呼地一声冲出教室。寂静了45分钟的校园一下子沸腾

起来。我们学校的操场很多，除了前面讲的两个大、中操场外，一二年级教室外还有一个小场子，这里是我们的天地。女生们比较斯文，一般玩的是跳绳、跳皮筋、丢手绢之类的游戏；男生们则呼朋引伴，在操场上相互追逐嬉闹。

“擂拱子”是那时我们男生最爱玩的游戏之一，一条腿盘起，用手拉着裤脚，单腿跳着去撞击对方，如果倒地或盘起来的那条腿落地了，就输掉了。“擂拱子”主要有上挑、下压、摆膝、顶撞等动作，可以两人之间玩，也可以集体玩。我们最爱的是全班的集体“混战”。几十个小男孩，一个个盘着腿耀武扬威地冲了出去，有的进攻，有的掩护，还有的专门偷袭，人声鼎沸，个个汗流浹背，不时会有人仰马翻。我们教室隔壁住着一位教初中的中年女老师，她有一个城里亲戚，是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操一口汉腔，在她家里住了好长一段时间。看到我们“擂拱子”玩得不亦乐乎，这位泼辣的大姐姐居然要和我们一起“擂”，当然欢迎啦。我们发挥小、快、灵的长处，轮番袭扰她，人高马大的汉腔姐姐盘起一条腿，在一群小男孩的包围中左冲右突，气喘吁吁。这时，全班都会过来观战、助威，场上充满了我们的欢声笑语。曾经有一段时间，因为说“擂拱子”损伤小孩膝盖而被学校禁止，不能大规模“擂”了，我们只能几个人偷偷小“擂”。

还有一种“挤油干”的游戏，一般是在冬天玩。那时的冬天特别冷，“挤油干”也是我们取暖的一种方式。这种游戏，人越多越“疯”越好。一般是在教室外面，大家分成两队，两边领头的靠墙中间、身体一侧相互抵着，两队的其他人再一个接一个紧紧抵在一起。一声“预备——起”，一二十人便铆足劲儿地往中间挤，一边挤，

一边口里还齐声喊着：“挤呀挤呀干叻，越挤越好玩叻！”不一会儿，大家身上就暖和了起来，甚至还冒出汗来。“挤油干”不光要有力量，更要有技巧，还要有团队协作。要想方设法用肩把对手挤出队伍并占领他们的位置，一旦一方有人被挤出队，后面的人要迅速接替上来，被挤出的人也会跑到队尾加入再战。有的鞋被踩掉了，有的扣子被扯掉了，有的棉袄被挤开了，有的裤子也挤脱了，甚至有时会“疯”得过头了把小个的同学挤得受不了哭了起来，但谁也不会去抱怨什么。有时候一方挤不过也会偶尔使一下坏，他们会突然后撤，对方就会倒成一片。自然，“挤油干”是男生的专利，几乎没有女生加入。

看小人书也是课间休息很重要的一部分。大集场上有个规模较大的日杂商店，里面有一个文化用品柜台，是我经常去的地方，只为里面摆的各种小人书。那时候经常会有三国等古代系列的小人书出来，什么《火烧新野》《草船借箭》《姜邓斗智》，可以说，我最初的历史知识都是从小人书里面获得的。为了买上喜欢的小人书，我会从过早费里抠一部分攒起来，如果考得好，家长也偶尔会奖励一下。我们有时会带一些小人书上学，虽然这是家长反对、老师也不提倡的，但只要上课不看，老师一般不会没收。课间休息时，大家会相互交换着看。那时，谁的小人书多、谁的小人书新，是一件很值得炫耀的事。

学校里还会经常组织各种活动，比如各种比赛、歌咏会、朗诵会等等。一次诗歌朗诵会，小学、初中各年级学生都端上板凳，到操场上集中。我记得听一个大姐姐朗诵到：

看见了甘蔗林，我怎能不想去青纱帐！



大集中心小学新建的教学楼

北方的青纱帐啊，你至今还这样令人神往；

想起了青纱帐，我怎能不迷恋甘蔗林的风光！

南方的甘蔗林哪，你竟如此翻动战士的衷肠。

……

她朗诵得声情并茂，我们却似懂非懂：“这个也是诗吗，怎么和我们学的七言四句、五言四句完全不一样啊？”

还有慢骑自行车比赛。地上画两条线，只能在这两条线内骑，脚不能着地，谁用的时间最长谁赢。这次参加比赛的都是老师，学生们围在四周为各自熟识的老师呐喊助威。

姜老师还牵头搞了一次全校跳绳比赛，项目有集体跳绳、个人速度跳绳和花样跳绳。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大哥的表演——他上得前来，手中的绳子并没有上下甩动，而是在腰间一晃，绳子左右翻飞，他的双脚像玩杂技般地左闪右跳，让人目不暇接，全场顿时掌声雷动。

(四)

孩子的感情是很质朴的。在我们眼里，老师是“高大上”的。比如姜老师，文能教书，武能耍棍。但没想到，姜老师也有受“欺负”的时候。那是一次公社组织的篮球赛，是成人的、正规的那种，在隔壁的老八中进行，姜老师是裁判，我们就都去看。只见两队人马摆开阵势，姜老师手里拿着球，口里念念有词，然后把球往上一抛——比赛开始了。刚开始还好，过了一

会儿，有一队人对姜老师的判罚有意见，围着他，怒气冲冲地说着什么，有一个人甚至推搡起姜老师来。这时，组织方赶紧过来扯劝，结果是一个50来岁的人成了主裁判，姜老师成了助理裁判。这以后，他吹哨子明显地犹豫多了。我们心里好难受，觉得姜老师受了委屈，大人们怎么能这样啊！

孩子是无邪的。有时下午放学早，我们偶尔会在高年级的教室外看他们上课。有一次看初中生上课，只见老师在讲台前滔滔不绝，但大多数学生却并不看黑板，只顾低头在各自的本子上飞快地记着什么。我心里顿时羡慕不已，“还是长大了好啊，不听讲，老师也不说什么。”有一次，一个女生被奖励了一个漂亮的塑料文具盒，在那个时候看起来很“高大上”，她爱惜得不得了。可过一阵子被班上的调皮男生弄坏了一块外皮，小丫头撅着嘴巴拿着笔盒去找叶老师主持公道。这时她读初中的姐姐过来拉她，说她小题大做，妹妹不依了，举起小拳头追打姐姐，姐妹俩在操场上像燕子一般地飞。老师

和同学们哈哈大笑，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下一年级，这女生转学去了县城里的小学，长大后她也成了一名老师。

孩子是懵懂的。刚上学时，我对考试完全没有概念。记得有一次期中考试后，我在外婆屋后的菜园子里玩泥巴，两手脏兮兮的。小舅从学校回来，拍着我的头说：“苕敏头考得不错，两门都是98。”考试，几时考试的啊？我一脸茫然。难道那天老师不讲课，只叫我们做题目就是考试啊？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啊。这种认识终于让我得了教训。下一次考试，我只考了个第八名，父亲很生气，严厉训斥我，说我没有用心：“今天晚上不许吃饭了！”偏偏那天家里请外公一家来吃饭，菜特别丰盛，大人们觥筹交错，我只能撅着嘴站在一边闻香。外公出来打圆场：“吃吧，吃吧，你看小舅，他考了第十名还能吃，你比他考得还好，肯定可以吃啊。”父亲却不肯让步：“让他饿着，叫他经经心！”这件事后，我开始明白了考试的“严酷”性，真不是好玩的，考得不好后果很严重的。

孩子更是充满爱心的。大集场偶尔会来一些外地的“讨饭”人，不是现在的“职业乞丐”，是真正的“讨饭”。他们往往衣着褴褛，手里拿一个脏兮兮的碗，肩上还有一个破袋子，哪家给了一点残羹剩饭，他们会当场吃掉；碰到运气好，好心人会给他们一点米，就装进那袋子里。有一个周末的下午，我和同学打完乒乓球回家，刚好看见两个外地老汉在我家门前的街上“讨饭”。他们破衣烂衫，胡子拉碴，狼吞虎咽地吃着别人给的剩菜剩饭。当时刚下完雨，天气又冷又湿，我感觉他们好可怜。天色已晚，街口靠墙的地方有一个帆布支起的棚子，是公社货站堆放杂物的地方，两人就在里面过夜。

这事在我心里挥之不去，吃晚饭都不安心，我决定尽我的力量帮助他们。主意拿定，我找奶奶把第二天过早的钱提前要了过来。那时过早费已经从五分涨到一毛了，我特意要了两个五分，还用家里的热水瓶盖舀了一盖子米，溜出了家门，把两人叫起。得知我的来意后，两个老汉很感激地朝我笑着连连点头。我把两个五分递到他们手里，他们是双手捧着接过去的，我还叮嘱要放好，然后把米倒进他们的小口袋里。一小杯米两个人分，太少了，我掉头回家又舀了一杯。做完这一切，我心里充满了兴奋，感觉像是完成了一件大事。

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好像是四年级的时候，大集学校进行了一次大的调整。隔壁老八中不办高中了，我们学校的初中整个转了过去，而大集场周围七湾八村的小学则全部并入了我们学校，从此成了大集中心小学。

时光荏苒，40年过去了，当年的年轻老师都已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不知是否安好？当年的孩子都已人过中年，在为生活奔波、为事业忙碌之余，不知是否有暇忆起昔日的点点滴滴？

（周敏：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副处长）

红色伉俪从鄂豫边烽烟走来

◇ 罗建华

陈潭秋、董必武的秘书，冯玉祥属下的英文翻译，陶铸汤池游击训练班的助手，鄂豫边区根据地专员，新四军五师联络部长，范文澜聘请的华北联大教授，华中农学院创建人——这一切集中在一位人物身上，该是多么叱咤风云的一生？童世光与妻子罗明德并肩战斗，坚守初心，保持革命本色。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一部《我爸我妈和我的故事》再现英雄传奇，红色伉俪从鄂豫边烽烟走来。

2018年清明节，我到汉川参加辛亥老人向岩的纪念碑落成仪式，一位年过七旬的女士致词，向肃立的中学生讲述先辈的故事，还动情地唱起《我爱你中国》。她名叫童晓晋，父亲童世光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共产党员，抗战时与回家乡汉川当县长的向岩结

成友谊，在一次被捕的生死关头得到这位名宿的营救。

我对这样的传奇故事充满好奇，不由与童晓晋深度交流，得知童世光解放后创立华农更觉新鲜。我有写日记的习惯，便在4月4日的日记中留痕：“童晓晋谈到他父亲解放初去省立农学院任院长，那些大学教授根本瞧不起土包子，手下没干部，只有少数学生团员帮忙，常常被起哄。一次晚会，教授们出他的洋相，要他表演文艺节目，他问有没有月琴，然后从容地弹了《梅花三弄》，方惊四座。殊不知，他是燕京大学外文系毕业的，曾有外交部副部长的安排，因耳朵重听怕影响工作，后被周总理改任为湖北省教育厅厅长。”

不久，我收到一本厚厚的《我爸我妈

和我的故事》，是童晓晋和她先生冯文学共同编著。金秋之时，我又赴南湖之畔的狮子山，在华农校史馆流连，并在10月15日的日记里写下：“童世光接手省立农学院，后主持院系调整，成立华农（并入武汉大学、河南大学、广西大学、中山大学、南昌大学的农学院及湖南农学院），为第一任党委书记。”

这样，从汉川汈汉湖到武昌狮子山，童世光、罗明德两位老人，身披鄂豫边烽烟，从历史深处一路走来。

信仰：一代知识分子的坚定追求

20世纪曙光初照，最先觉醒的是一代知识分子，他们出生于大户之家，成长于国难之时，却首先背叛自己的阶级，为劳苦大众求解放，为忧患之邦争富强。

童世光和罗明德，显然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代表，他们以坚定的信仰为坐标，从不畏牺牲的起点，到不计名利的终点，那一生只能用“追求”来概括。

童世光，1904年出生于武汉近旁的汉川，青少年时期求学于武昌圣约翰中学、文华大学预科，后进入燕京大学。1925年毅然在家乡参加革命，1926年入党，几乎经历了早期革命者经历的一切：地下工作、武装斗争、政权建设、国际联络等无不涉及。他任过陈潭秋和董必武的秘书，作为总交通迎接过北伐军攻克武汉，组织过农村秋收暴动，为冯玉祥每天翻译综合过信息参考，参加过“中国反帝大同盟”，足迹遍及上海、青岛、天津、北平，真叫“提着脑袋闹革命”。

抗战爆发后，童世光奉董必武之召急回湖北，协助陶铸开办汤池游击训练班，

出任临时学校校长培养大批干部，从此落脚在鄂豫边，成为天汉地区老百姓熟悉的“童专员”，成为新四军五师与美国航空“飞虎队”打交道的联络部长。

罗明德本是武昌城的大家闺秀，父亲乃辛亥首义先驱罗锦，与喻育之一一起负责攻打中和门，迎接南湖军炮队和马队进城。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罗明德在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就读，参与何功伟组织的武汉声援活动。1937年毕业于黄州中心小学教书，此时黄冈中心县委书记刘西尧（解放后任第二机械工业部、教育部部长）恰在校内掩护地下工作，介绍她参加“民族先锋队”活动。刘西尧晚年撰文回忆：“我觉得她想进步，直爽真诚，迟早会成为我们的同志的，并且在心中已经将她视为同志了。”



1946年，童世光、罗明德夫妇在中央晋冀鲁豫党校与女儿童幼明合影

于是，我就给她一些进步的书刊学习，以提高她对党的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1938年5月，国民党地方当局驱逐武汉来的青年教师，罗明德等同志不得不撤离……董老介绍他们去了河南确山竹沟的新四军四支队八团队留守处，正式参军。同年9月，她以出色的工作成绩和政治表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罗明德来到鄂豫边，开始浴血奋战，艰难困苦莫过于“竹沟事变”和中原突围，这给带着十几天大的婴儿就地隐蔽的她以生死考验。短短四个月惊心动魄，落入虎口、确山脱险、化装突围，一波三折，九死一生。好在共产党人同老百姓有着血肉联系，她得到魏医生、张老头、李大嫂等普通群众的冒死相救，其过程跌宕起伏，险象环生，远胜过一些电影、电视剧故事情节。

童世光一生更是惊涛骇浪，鄂豫边情势复杂多变，他周旋在敌、伪、顽、奸、特、匪之间，三次被捕，命悬一线，有幸得到上

层民主人士杨显东、辛亥元老向岩等三度援手，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坚称他的秘书都知道“童世光是个大共产党”，经反复争取才幸免于难。

奉献：两位前辈的高尚境界

走过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穿越枪林弹雨的战争硝烟，童世光、罗明德经过多少洗礼，却从来不把磨难当作伸手的资本，而是当作奉献的动力。

当年，战争从没有让女性走开，注定使她们多几重艰辛，不仅婚姻生活凄美曲折，做了母亲更为痛楚揪心，每当一个新生命呱呱落地，就是一次生离死别。

罗明德的四个男孩，生一个送走一个；解放初找回两个，一个永远下落不明，另一个因老战友受理上访信在1961年才偶然获得线索，仍让他留在了大洪山深处务农一生。

罗明德还有两个女儿，大女儿送人无人收养，肯收养的也只能当童养媳，这才依偎着母亲活了下来。小女儿在中原突围后生于山西晋城，撤退前送人碰上好机缘——新媳妇因婴儿夭折而收养，小女儿却三天三夜啼哭不止，在部队开拔前一刻被送了回来，有幸在马背摇篮中翻过太行山——她就是为我讲述故事的童晓晋。



1950年，童世光（右二）接管湖北省立农学院

童世光早在1927年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就把在武汉大学预科读书的小弟童世秀动员回来，参加了贺龙的红军。后来又毕业于湖南大学的哥哥的四个女儿，全部送进了革命队伍。

新中国百废待兴，童世光、罗明德已从西柏坡走进京华，双双在董必武主持的中央政法委工作，但湖北省政府主席李先念一通紧急电报，就将童世光召唤回汉，随后罗明德也被催回

来。从接收省立农学院，到创办华中农学院，他们一辈子留在了狮子山上。

本来，1952年因外交工作需要，抽调一批将军当大使，童世光因其燕京大学外语系毕业又曾任联络部长，被陈少敏推荐为外交部副部长人选，可他担心耳疾误事而谢绝，由周恩来总理任命为湖北省教育厅厅长。不久他又坚辞厅长之职，重回华农创业。同一时期，组织上安排罗明德过江，到位于汉口的武汉医学院主持党务工作。但开山建校刚刚起步，她舍不得离开，选择同丈夫一起坚守华农，长期担任办公室主任、工会主席等职，辅助工作。

在华农校史馆，我看过图片上曾经的荒坟野丘，再徜徉绿荫掩映的现代校园，深感时光虽已流逝，而无数莘莘学子和这满山参天大树一道，一批批长成栋梁之材，留下永远常青的丰碑。



1977年，李先念（左一）副主席会见童世光（左五）、罗明德（左四）夫妇

两位老人资历颇深，职级却几十年停留在战争年代的地师级、县团级，甚至由正而副、由实而虚。华农的老人都知晓，童世光先将院长一职请民主人士担任，自己任党委书记；后请一位老革命来主持工作，自己改任第二书记。所以，当他八十寿诞时，一幅庆贺立轴上题诗：“老骥伏枥奔万里，坎坷征途志不移，一生艰朴心向党，从不与人争高低。”

李先念晚年几度回湖北，与老同志会见合影，总要将童世光拉到第一排身边。童世光的大女婿、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肖健章，战争年代曾任李先念秘书，多次听到李先念称赞童世光“心中总是想着别人”，并用“三次让贤”的故事做其他老同志的思想工作。

当年，童世光把自身大地主之家的田地房产全部分给穷人，带领手枪队镇压放高

利贷的恶霸地主堂伯母，从那一刻起，就把一生交付事业，奉献给党。晚年，他追念陶铸时引述陶铸《过汤池》《大洪山打游击》诗句：“风自寒人人自瘦，拼将赤血灌春花。”“正义终能除大敌，丹心永照著鸿章。”表达的不正是一代共产党人的共同襟怀？

传承：三个人物的独特记忆

《我爸我妈和我的故事》以人为经，以史为纬，织出厚重的历史烽烟图卷。全书由《世纪之光——爸爸的故事》《明德惟馨——妈妈的故事》和《岁月如歌——小晋的故事》三辑构成，前两辑名称恰到好处地嵌入两位老人的名字，钩沉历史风云，传承精神血脉，留下一份独特的红色记录。

颇为难得的是，书中“童世光文选”部分存文15篇，留下他在灾难重生年代的思考探求。1928年所译《英报之日帝国主义在满洲的前途观》（载上海《东方杂志》12月号），介绍英国政党和媒体对远东时局的观察及态度，较早警醒国人应对日本的侵略野心。1941年所写《县城沦落后的汉川》（载《七七月刊》第一卷第四期），长逾万字，制有表格，分社会经济状况概述、抗日民主政治之发展、经济教训总结三大部分，是不可多得的文献材料。《史沫特莱访问田二河》《不可弃之不用重大法宝》等文，有史迹有论述，有助于今天加深理解统一战线的必要作用。

书中还收录湖北省顾问委员会主任陈明等老战友、老部下的相关回忆，立体再现了艰苦卓绝而又错综复杂的斗争场景。其中，童世光、罗明德与董必武、李先念、陈少敏、曾志（陶铸夫人）等老革命家的人生交集，加重了其史料价值的分量。

童世光鲜有手书墨宝留下来，我见到一幅“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又见到一幅“对真理的追求比对真理的占有更为可贵”，正是这对红色伉俪革命一生的写照。

我打小爱阅读《红旗飘飘》《星火燎原》等革命回忆录，对鄂豫边区并不陌生，但红色伉俪童世光、罗明德的英雄传奇仍令人震撼。2021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我爸我妈和我的故事》用红色基因感染后人，更有一层特别的意义。

（罗建华：长江日报报业集团高级编辑）

户部巷食话

◇ 曾庆伟

如若说及武汉三镇居其一的武昌食事，就不能不说蜚声荆楚、名扬九州的汉味早点第一巷——户部巷了，它已经名副其实地成为汉味小吃的代名词。

（一）

以老武汉人的认知，其实户部巷有新老之分，有广义与狭义之别。

所谓狭义的户部巷抑或称老户部巷是指武昌古街区遗址中的一条小巷，其历史久远，明清时期就已存在，但在相当长的岁月里似乎一直都没有多大的声名。

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武汉地名志》对“户部巷”的介绍数语寥寥：“位于武昌区民主路西段以北，沥青路面。门牌1~43号。系明清时古巷，名由不详。1967年改名红安一巷，1972年复名户部巷。两侧多

老式砖木房屋，旧貌尚存，居民稠密，不通汽车。”

作为现今武汉地标之一的汉味特色风情街区——新户部巷，在21世纪初声名鹊起，其面貌逐渐为世人所知。但是这条古巷的名由缘起，迄今为止却是云山雾罩，有的说法语焉不详，有的说法牵强附会，各种不同说法甚至是错误信息，把户部巷的前世弄得扑朔迷离、湮漫难识。

老户部巷与长江呈垂直状，长147米，宽3米。为何一条小巷会冠以“户部”之名？是否与“户部”这一机构有直接的关联呢？

户部，中国古代官署名，六部之一，为掌管户籍财经的机关，大致相当于现在民政部和财政部等部门的职能范围。

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武汉历史地图集》刊载的1883年《湖北省城内外街道总图》（出版单位：湖北省善后总局，

收藏单位：武汉市图书馆）上，有户部巷的明确标注，其位置在藩署与粮捕府署之间。这也是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有关户部巷最早的文字和图示记载。这也说明，老户部巷在清代就已存在。

检阅张廷玉等撰的《明史》发现，老户部巷与武昌历史上短暂存在过的陈汉政权有直接联系。在元朝末期，由农民起义领袖陈友谅、陈理父子所建的陈汉政权前后维持了五六年时间，行政中心大部分时间在武昌。当时所设立的“户部”，就位于今天的户部巷汉味特色风情街区。

明清几百年间，武昌城廓有所扩大，但行政中心的变化较小（把1883年的《湖北省城内外街道总图》与明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司志总图》两相比较即可得知），当年陈汉政权的户部所在地又相继成为明清两代的布政使（明代称承宣布政使，清代称藩司、藩署）衙门，而老户部巷一直与明清两代的湖北藩司衙门（今户部巷风情街）比邻，从未迁走，久而久之，当地百姓就约定俗成地将这条巷子以“户部”名之，流传久远，至今仍在沿用。

（二）

20世纪40年代，三镇市民知晓武昌有个户部巷，主要原因是这里有个叫谢荣德的人，他炸出的面窝闻名三镇，被市民誉为“户部巷谢氏面窝”。

面窝是武汉的传统小食。清光绪年间，汉口汉正街集家嘴附近，有一个名叫昌智仁的熟食经营者，发明了以大米为主要食材炸制而成的小吃——面窝，此为面窝在武汉百年流传的嚆矢。

有一个叫谢荣德的武昌居民，早期以

肩挑小担、沿街炸面窝为业。到了40年代，他在武昌户部巷租了一间小门面，开始固定售卖炸面窝。

谢荣德炸面窝有绝活。他在传统油炸面窝的基础上，根据顾客的不同要求，炸制焦软程度不同的面窝。比如老人牙齿不好，他就炸成圆圈形的泡软面窝，俗称“圈圈”。年轻人喜爱焦脆的口感，他就在火候上加以照顾，炸成“焦片”面窝，俗称“片子”。他还别出心裁，炸制出了一种“夹面窝”：将炸好的面窝再涂抹上一层生浆，投入油锅复炸。这种面窝外软内酥，老少咸宜。户部巷的面窝声名大噪，凡从汉口坐轮渡到武昌尝鲜的人，莫不以到户部巷谢氏面窝店铺一尝为快。

2002年，武昌区政府决定实施“早点、健康、就业、防盗、互助”五大亲民工程，选定了拥有12家小吃经营户的一条老旧小巷（老户部巷），作为打造“汉味早点一条街”品牌的试点，这也是今日汉味特色风情街区——新户部巷的发端。经过多年的建设改造，户部巷从只有12家小吃经营户的小巷，发展成由户部巷老巷、自由路、民主路西段和都府堤南段组成，各类经营门店约340个，其中从事小吃经营的有160余户，经营品种达170余种，集餐饮、购物、旅游为一体的风情街区。

这也是户部巷的广义定义。

户部巷能有如此这般的宏阔气象，实在应该得益于武汉九省通衢的区位优势，得益于武汉地方文化兼收并蓄的开放胸襟，得益于武汉乃至湖北全省小吃品种繁多的雄厚物质基础。如果没有湖北各地小吃品种多元性的丰富存在，武汉也就不会有多得让外地人眼花缭乱的小吃品种，也不会成就户部巷如今“汉味小吃第一巷”的耀眼荣光。

(三)

既然说如今的户部巷为汉味小吃作了代言,那么,我们有必要了解武汉乃至湖北小吃的前世今生。

小吃,也称小食,古时的点心也属小食之列。在历史长河中,湖北人民创造了品种繁多、风味各异的地方小食,为早餐品种的丰富性、就餐的便捷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各色小食既是湖北人过早的主角,也可在各种宴席和宵夜中充当主食。

“湖广熟,天下足”,湖北省地处长江中游,河网交织、湖泊星罗棋布、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自古以来就是著名的鱼米之乡。湖北小食历史悠久,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郢都。郢都既是楚国鼎盛时期的国都,也是楚文化的发祥地。出生在湖北省秭归县的伟大诗人屈原,在《楚辞·招魂》中有“糍粑蜜餌,有餍餍些”的文字,记载了楚国宫廷筵席的小食品种。这是湖北小食见诸文字的最早记载。

据《齐民要术》所记,“糍粑”即膏环,其制法是:“用秬稻米屑,水、蜜漉之,强泽如汤饼面,手搦团,可长八寸许,屈令两头相就,膏油煮之。”“糍粑”也就是现在湖北小吃“麻团”“欢喜坨”和广东小吃“大良煎膏”的雏形。“蜜餌”也就是现今“甜麻花”“甜馓子”等小吃点心的雏形。楚国小食的用料,有大米、小米、新麦与黄粱。

据《风土记》载:“元日造五辛盘。”“辛”与“新”音通,取迎新之意,“五辛”者,葱、蒜、韭、芸苔、胡荽也,其味辛辣。

“元日”是正月初一。这在《荆楚岁时记》中也有记载。到唐宋时“五辛盘”逐渐被“春盘”取代。《四时宝镜》载:“立春日,

食芦菔、春饼、生菜,号春盘。”清代以后,“春盘”制作更进一步,其馅由芹、韭、笋组成,表示勤劳、长久、蓬勃之意。随着时间的推移,春饼跳出了“春盘”的框架,演变成四时皆备的小食。这也就是今日湖北小吃“春饼”“春卷”的由来。

梁朝吴均在《续齐谐记》中说,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以楝叶塞其上,以彩丝缠之,不为蛟龙所窃。即粽子之源起。

湖北为历代文人游历、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高炉饼”“九黄饼”“春饼”“东坡饼”,这些经典小食与李白、苏东坡等文化巨匠在湖北的生活有直接关系。湖北小食发展到唐宋时,已有相当高的工艺水平,形成独有的风味特色,弥散出浓厚的地方文化韵味。

到了明清时期,湖北小食的发展趋于成熟,品种繁多,以小吃为主体的小食店、小吃摊点,在湖北各个城市中随处可见。武汉作为湖北饮食文化的中心,已经成为集湖北各地风味小食之大成的平台。清道光年间叶调元《汉口竹枝词》中记道:“汉皋风光最繁华,廿里嚣尘百万家。不是文人才笔大,焉能写尽各生涯。”“大通巷馐子、狗肉巷豆丝、祖师殿汤圆、皆俗所引重者。”“芝麻馐子叫凄凉,巷口鸣锣买小糖。水饺汤圆猪血担,深夜还有满街梆。”由此可说明至少在清朝道光年间,湖北的小食品种已经非常丰富。

历代文人墨客为后世留下了诸多有关湖北小食的诗文,这些诗文不仅告诉了我们当时有哪些小食品种,还给我们描绘了一幅生动的彼时饮食风俗画。从以上文献中不难看出,小食在湖北的历史悠久、品种繁多、用料广泛、需求量大,而且还荟萃了全国各

地的名点精华，形成了独特的地方滋味风格，赢得了湖北民众的广泛喜爱。

（四）

湖北小吃用料广泛，制法各异，这与它富饶的水陆资源，具有“千湖之省”的地利条件是分不开的。湖北丘陵环绕，中部则有水系成网、辽阔肥沃的江汉平原。全省盛产米、麦、豆、藕、莲、蔬、果、薯、菇、鱼、肉、禽、蛋、野味、桂花、木耳、油料等，特别是淡水鱼、虾、蟹、鳖等水产资源极为丰富，所有这些物产为湖北小吃的制作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物质保障。

位于湖北省京山市的屈家岭文化遗址是我国长江中游地区发现最早、最具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大型聚落遗址，距今5300 ~ 4600年。屈家岭遗址还是长江中游史前稻作遗存的首次发现地，是中国农耕文明发祥地之一。古往今来，稻米一直是湖北农作物的主要品种之一。湖北位居九省通

衢之地，早餐宜粉宜面，有资料统计，80%左右的湖北人每日早餐的品种是面和粉。又由于湖北多水，水丰而鱼多，湖北的小吃品种中，以鱼鲜入食就很常见了。比如糊汤粉，就是在细圆米粉中，加了一勺以鲫鱼熬制的糊状鱼羹，好像是对湖北久负盛名的鱼米之乡作了直观的诠释。

与湖北丰饶的五谷出产和丰富的小吃产品相对应，湖北小吃制作技艺也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有炸、蒸、烙、煮、烤、煎、炒、煨、熬、炖、烩、灌、烧、炕、扯、冲、酿等多种技艺方法，经过擀、包、裹、卷、切、叠、捏、搓、盘、削、嵌、揉、挤、剥、擦等操作技艺制作的各式风味小吃，深受世代湖北人民的欢迎。

湖北小吃用料讲究，制作精细。这与楚人生活比较风调雨顺，有闲情逸趣来侍弄饮食品种有很大关系。比如武汉小吃的标志产品三鲜豆皮，在制作上严把选料、磨浆、火候三关，做到皮薄、浆清、火功正，具有油均、料全、内软、外脆的特点。汤包，选

料专用皮薄肉嫩的湖猪，用腿夹肉而不是五花肉；发酵方法不是酵面兑面粉，而是用曲子酵，在包馅中讲究“剂准、皮圆、馅中、花均”。枯炒牛肉豆丝，选用黄牛的梅子肉，豆丝则用青山的黄米粘和武昌县（今江夏区）的绿豆，炒豆丝非用芝麻油不可，严格做到一次炒一



户部巷

盘。糊汤米粉，选籼稻米磨浆制粉，用活鲫鱼、鳝鱼熬煮成汤汁，加水调入淀粉制成糊汤。什锦豆腐脑，专用监利县（今监利市）朱河白糯米、大粒黄豆、小把起酥的徽子制成，用老锦春酱萝卜腌香剁碎，佐以小磨芝麻油、胡椒、香葱等，吃起来特别鲜美。

湖北小吃还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应时更换品种。湖北气候四季分明，每当春暖花开、柳枝吐绿的季节，各色春卷、春饼、大小汤圆、油糍粑、油香、油墩、炸糖年糕等传统小吃品种相继出现。在烈日当空、盛暑炎热的夏天，各种凉糕、凉粉、凉面、伏汁酒、粽子、豆腐脑、八宝稀饭、冰糖莲子、各色发糕等大量应市。每当桂花飘香、金风送爽的秋天，蟹黄汤包、蜜汁甜藕、桂花糍粑、红薯面窝、九黄饼、荷月饼等源源上市。在腊梅怒放、三九严寒的冬天，热腾腾的八卦汤、糍粑鸡汤、银耳莲子羹、羊肉汤面、各种年糕、小汤圆、核桃糊等，给人们驱寒送暖，滋补养身。

湖北小吃走了一条兼收并蓄之路，有对全国各地小吃精华的吸收，和对全省各地风味特色的萃取。所谓吸收是指把全国其他地方小吃品种的风味特色，经过学习，转化成为深受湖北民众喜爱的小吃品种并一代一代向后世延续。所谓萃取，是指将省内汉沔、荆南、襄郢、鄂东南、鄂西南等五个风味区的小吃精华整合而成，丰富湖北小吃品类。

总体而言，湖北小吃取料广泛、技法多样，能满足男女老幼不同消费者的口味，亦能适应全国南北西东各地人的口味需要。湖北小吃以米、豆、面、藕制品最具特色，有着鲜明的楚地文化风味和浓郁的鱼米之乡乡土情韵，代表了长江中游小吃制作的较高水平，历史传承悠久，影响力日益增强，在全国餐饮界中有较高的认同度。

武汉市是湖北省的省会城市，武汉小吃是湖北小吃的集大成者。本省各地小吃品种和从外省引进的小吃品种经过数代武汉人的改进与改造，也就变成了武汉小吃而被广大市民享用。据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武汉小吃》统计，市面上，武汉早餐有蒸食类、煮食类、炸食类、炕食类、其他类等190余种。

值得称道的是，户部巷传承了悠久的湖北饮食文化，以小吃品种之丰富多样，风味之地道醇厚，影响辐射能力之巨大，已经成为一张亮丽的武汉饮食文化名片，是向世界洞开的一扇认识武汉、了解武汉的大门，是各地来汉游客体验舌尖上旅行之乐的美食胜地，也是对武汉这座城市居民锦绣生活所作的最具烟火气的一个生动诠释！

（曾庆伟：江汉大学武汉研究院特聘教授，湖北楚菜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评审专家）

文联大院漫记

◇ 张明建

(一)

汉口解放公园路48号，是老文联大院旧址，它建成于1958年。当年位于武汉市郊，周边多为菜地。因附近黄孝河上的一座木桥，人们称那片为花桥。在临街的十字路口处建有很气派的L型办公楼，院内有三栋两单元三层的宿舍楼，红砖红瓦、砖木结构的楼房与红砖铺成的小路连在一起，另外有一片平房，是文联的食堂和部分后勤人员的宿舍。办公楼后有个小花园，家属楼的二栋和三栋隔得近一点，面对面，一栋在二栋的背面，背靠着马路，在一栋和二栋之间有很大的一片空地和水塘。1958年，那片空地建过小高炉，炼过铁。1959年，食堂在那里种过菜，在车库养过猪。那块地的一部分也曾当自留地分给家属以改善生活。

大院的整个布局疏密得当，舒适宜住。我的祖父张肇铭当时住在三栋二单元二楼东套间。三房，带阳台，单独的厨房、厕所。厕所里是座式马桶，这在当时不多见。房间铺有地板，只是地板和楼下天花板的间距较小，楼上小孩动静大了，就会影响到楼下。房间的隔墙用竹子和稻草做衬，粉上石灰。可以看出当时的建筑经费并不宽裕。

最初同住一个单元的，祖父家对门的是美协书记师群一家。三楼是市文联的作家易原符一家。三楼对门的是钢琴演奏家汪培华、作曲家冯仲华一家。一楼对门是徐迟一家。楼下有作家李蕤一家。隔壁是话剧院的演员石琦和美协干部龙海义。之后这个单元还住过文联书记骆文、话剧演员陈况、音乐家任景平、话剧演员赵振生等。

记得歌舞剧院、话剧院的住一栋的较多，如在全国都是最棒的演员哈珊、司徒莺，

笛子演奏家孔建华等。住在二栋的有著名画家周韶华、张善平、武石、卢柏森，音乐家梁思孔等。

据《湖北文联60年》一书所记，湖北省文联1950年成立，机关刊物是在郑州创办的《长江文艺》。叫文联其实只有作协一块，筹建时的名字就是“湖北省文协文艺工作团”。1958年搬进新建的文联大院，当时办公大楼的门口挂有四块牌子：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会、中国戏剧家协会武汉分会、中国音乐家协会武汉分会和中国美术家协会武汉分会。1960年，武汉市文联筹备委员会成立，大院内便有了两套文联的班子。文联的行政沿革有点复杂。武汉剧协成立较早（1956年），美协、音协成立较晚（1957年）。湖北文联《大事记》记载，这几个协会1960年9月划归湖北省文联领导。所以人们日后在介绍这个时期几个以武汉为名的协会时，会在后面加一括号（湖北）。



1964年，中国美协武汉分会部分成员及领导在老文联办公楼前合影。前排左起：周韶华、武石、张肇铭、唐云、江丰、杨平；后排左二为卢柏森，右一为王居平

1960年以后成立的协会就开始以“湖北”开头了。大院住有各个协会的工作人员、《长江文艺》编辑部的工作人员、武汉歌舞剧院和武汉话剧院的演员、工作人员等。

（二）

很多人写过老文联大院，主要原因是那里曾经非常集中地住过太多中南地区文化艺术界的名人。1954年中南局撤销，很多文化名人留在武汉，后来大多住进了这个大院。有很多20世纪30年代就活跃在文坛的作家，有左联的文化人，延安过来的作家、诗人、音乐人，南下的文化干部，新中国成立前就享有盛名的剧作家、演员、画家。有文章以《一院子故事》为题谈及文联大院，很抓眼球的。

大院建好之初，有过一阵风的大炼钢铁，我曾走访文联的老人，回忆时谈到曾建

了座土高炉，请了武钢的专家，没出铁。后来请了位农村的“土专家”，搞了几天，才炼出铁来。敲锣打鼓送喜报后，这事就结束了。直到1966年，文联大院都比较平静，大概可用“祥和”这样的词。

我因祖父住文联大院，1959年读育才幼儿园时，有一年都住在那里，之后是逢周日、寒暑假都在大院度过。“文革”停课期间，我也完全

住在大院，以致童年的记忆与文联大院没法分开。我喜欢往那里跑，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祖父的住房宽敞，有书可看。二是那里有玩的地方和玩的伙伴，即使是办公大楼我也常去玩，到楼顶放风筝。

我记得，文联有一台华沙牌轿车，接送人时在红砖小路上驶过，小孩在后面追赶。还记得大院做卫生时，有人一喊，就一家出一人去做卫生的情景。大院有些树还是植树造林运动时，住户自己买树苗栽种的。我奶奶曾指着我们门栋前红砖小路转弯处的一棵法桐说过，这是我们买树苗种的。那棵树长得快，已经很粗了。



1957年，张明建（中）与祖父母张肇铭、谢纬业合影

那段时间文联的工作是围绕社会主义建设出作品、出人才。1960年，中国作协的驻会作家碧野从北京调到湖北省文联，带有任务，要写正在建设的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为此他长年到工地深入生活。湖北文坛著名作家姚雪垠、碧野、李蕤，当时都住在文联大院。姚雪垠就是在那个时期开始创作长篇小说《李自成》的，1963年出版了第一卷。

1961年著名诗人徐迟从北京调到湖北，碧野有篇回忆文章《文苑春长驻》，谈及徐迟的抱负：“抗日战争时期，有个《黄河大合唱》，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应该有个《长江大合唱》。这就是徐迟的抱负。”

徐迟一心扑向长江，邀集全国的一部分作家和音乐家组成《长江大合唱》工作组，深入生活，做了大量工作。诗人徐迟热爱音乐，为大女儿取名徐律，为小女儿取名徐音。在徐音4岁时便让她跟楼上的汪培华学习钢琴。

那个时期文联的组织机构也在逐步建设完善。我查了一下，1958年成立了湖北曲艺家协会，1960年成立了湖北摄影家协会，1962年成立了湖北舞蹈家协会。

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方针的指导下，各类作品成果累累。住隔壁三栋一单元二楼的龚啸岚时任剧协副主席，在那个时期先后完成了《宝莲灯》《二度梅》《金田起义》的创作。人们评价他的成就是提高了楚剧品味。

祖父那个时期也非常忙碌，常不在家。1959年，在丹江水库工地写生，并为庆祝丹江截流典礼作



著名画家江中潮绘制的老文联大院全景

长卷《建设中的丹江全景》。1960年，参加全国第三届文代会，到郧县“三同”，画过一批写生发表。1963年，在北京举办个人画展。

(三)

“文革”开始时，最初人们忙着为办公楼布置毛主席画像，用红纸书写毛主席语录。我见过祖父在家里为布置文联大楼而书写的毛主席语录，按要求用大红纸书写，还从家里清理出几个镜框装好，一块儿让人拿走。

有一阵，搬东西是大院里的一景，先从办公室往家里搬。人们接到将办公室、画室腾出来的通知，画家们在家人的帮助下把画室里的瓶瓶罐罐、笔墨纸砚往家里搬。作家们的东西简单些，就是书。那时，我和弟弟明进、明荣在祖父的画室清理书籍、画具。画室不大，祖父一边指挥，一边还对我们讲

起当年为丹江分洪工程作长卷的故事。墙上、地上、桌上都是画稿，我们在那儿几天都没回家。腾出来的办公大楼后来成了支左驻军的师部，一栋和二栋间大片的菜地、草地也被清理出来，成了篮球场和部队训练的地方。

驻军待的时间不长，湖北省体工队的男子排球队也来住过一段时间，

每天去看他们训练还是很有意思的。

没过多久又开始从家里往外搬东西，把一些书搬到外面收荒货的板车上，工作量很大，要全家动手。那些作家、画家、诗人们自己搬，也在窗口看着别人家里搬，只是偶有三五岁的小孩子抱着一本如砖头厚的书跑出来扔在地上，赶着又回去搬下一趟，那动作、神态给大院带来些许生气。

祖父卖书时我不在花桥。有一天进门，在几个书架上都看不到书了，只有《毛泽东选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鲁迅全集》，占不满一个书架，其他的书架成了杂物架。祖父递给我两本《鲁迅小说选》，说是专门给我留的。之所以给我留书，是因为在那之前好几年的时间里，我每个星期天到花桥去玩，大多数时间都是看书，逮着啥书看啥书，订了十多年的《人民文学》和好几年的《长江文艺》都看完了。祖父清理书时就在念叨：“都卖了明建来了看啥？给他留几本吧。”

1967年年底，省文联干部及各协会干部随省直机关来到黄陂。祖父在那儿干得多的就是摘菜和拔草，拔草要蹲在地里，弯着腰，晒着太阳，70岁的祖父在站起来时直直地倒在地上人事不醒。

各地相继建了“五七干校”后，那里的干部多被迁往湖北沙洋七里湖农场，市文联的干部则下到了咸宁崇阳。祖父则因为摔了一下而提前拿到了“结业证”。

从黄陂回家后，祖父有时也会靠在藤椅上要我们几个兄弟背毛主席的“老三篇”，他不拿书，对我们背错的地方会马上指出来，并对我们说，在干校像他们这样的老人都能背得很流畅，我们小孩没有理由背不好啊。

（四）

大院里很多人因下放和调动工作，搬走后就没回来。大院里的住户陆续换了，祖父家对面的师群一家搬走了，随后搬来的是骆文一家。骆文家有台小电视机，每逢有京剧和球赛时便会过来请祖父一同观看。

1972年3月以后，省里从“五七干校”调出少数作家回汉成立了湖北省文艺创作室，开始恢复文艺创作。祖父家里来客多了，学画、索画的都有。大院的小孩也开始选择喜欢的专业，到最棒的艺术家里，学习音乐、乐器、绘画、书法、写作等等。

文联宿舍曾交给了市公房处，不知何时，一栋和二栋间的空地上建了楼房。1978年，省文联恢复时搬到了武昌。同年，市文联在老文联大院的办公楼恢复办公。拆掉了办公楼后的花园，背靠办公楼，盖了一栋宿舍楼，还用一截院墙和原来的大院分隔开来。后来，办公大楼由三层加到了五层，楼

顶上模仿原样做了个圆顶。1999年，随着几栋家属楼的拆除，老文联大院最初的格局不复存在了，大院除了办公大楼，也再看不到过去的模样了。

老文联大院承载了我太多儿时的记忆，留下太多的故事和历史。几十年后，大院里剩下的老人没几个了，但我仍然和大院有着无法割舍的情感和千丝万缕的联系。

近十来年，回忆似乎成为我周围很多人生活的一部分。当我为祖父作传时，为了解祖父的过去，曾走访文联大院健在的老人，如张善平、鲁慕迅、周韶华、朱仪、王居平、龙海义、石琦、姜弘等。这个过程，续写着我与大院的缘分。

2021年5月，由团结出版社出版发行的《记忆深处的文联大院》，主编是李蕤的女儿宋致新，作者是大院文艺前辈们的后代，30余篇文章，从个体的角度记录了这个大院的一些往事。本文选用了书中有关大院的图片，可以让读者感受一下大院原有的格局。有图有文，应该有些史料价值了。

（张明建：张肇铭长孙，文史学者）